

維新、經世與士人辦報—— 以杭州《經世報》(1897-1898)為個案 再論維新報刊史

徐佳貴*

過去探討清末維新時期士人辦報的研究，多以《時務報》為代表，本文考察杭州《經世報》，藉以檢視此類代表與其他報刊的具體歷史聯繫，以及媒介變遷與近代思想史的關聯。在發行運營方面，其時士林報刊普遍依賴官場、捐款等非市場性要素，然報刊數量不免供過於求，導致以《時務報》為核心的售報網路繼續獨大，使得位處《時務報》影響範圍的《經世報》，難以緩解自身的生存壓力。就體例與內容環節觀之，《經世報》較《時務報》更著力於維繫中土經世傳統對於外來知識資源的包容性。且在報館對應的學會中，其經世訴求與浙省的地域性學術傳統尚有結合。然而，因讀者對新媒介新舊夾雜的成見使編撰方更為頻繁地受到考驗，這種對傳統的強調受到了更大的非議。概言之，《經世報》弔詭地展示了趨向「傳統」的、使維新報務延續既有之經世意識的探索路徑；然而，當時報務「準市場化」的特徵，更有利於早先的標竿鞏固其地位，而另起爐灶、進而扭轉時風的企願，與以書籍為主的時代相較，變得更難實現。各方博弈的後果，更多的是報刊對士林的改造，而非相反。相應地，報刊所促成的經世思想推至空前的廣度深度，卻又使經世對於時代思潮的統攝力發生問題，進而開始為愈趨明晰的新舊之分野所衝擊，乃至取代。

關鍵詞：維新、經世、士人、《經世報》、媒介變遷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中日甲午戰後，中土士人爭言變法維新。其中一項重要表現，便是多半未在國內外受西學訓練的士人廣泛介入辦報。¹其中普遍被認為最成功的上海《時務報》，現今的討論也相對細緻，且已涉及「新文化史」意義上的書籍史或閱讀史研究取向。²其時上海尚有不少士人報刊，而各地士人亦有辦報之舉，較常提及的有澳門《知新報》、天津《國聞報》、長沙《湘報》、《湘學報》等；另有溫州《利濟學堂報》(半月刊)、福州《福報》(報紙)、重慶《渝報》(旬刊)、成都《蜀學報》(旬刊)、廣州《嶺學報》(旬刊)、《嶺海報》(報紙)、桂林《廣仁報》(初為旬刊，後為半月刊)、無錫《無錫白話報》(五日刊，後改稱《中國官音白話報》)等。在現今的近代史書寫中，對於《時務報》的定位，及對其特徵的歸結，似均可直接投射到以上這些「呼應者」身上；士人廣泛介入報務的初

¹ 按當時許多稱「報」者今日看來都是「刊」，當然也有明分「報」與「刊」者，如《國聞報》與《國聞彙編》之類；另如《時務報》本身是旬刊，復有《時務日報》與之配套。而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開篇對報紙與雜誌作過區分，報學之「報」當指報紙，可該書所論卻仍包括雜誌期刊。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21。今有學者從語詞史的角度考證稱，似乎要到日語「雜誌」傳入中國、廣為人所接受，報紙與期刊雜誌才真正實現兩分，見陳江，〈「報」與「刊」的分離及雜誌的定義——中國近現代期刊史劄記之一〉，頁65-67；李玲，〈從刊報未分到刊報兩分——以晚清報刊名詞考辨為中心〉，頁144-153。當然這主要是就體裁而言，事實上維新時期之後不少刊物依然以「報」為名。限於主題，本文對「報」與「刊」在時人觀念中的同與異不擬深入討論，而就《經世報》來說，與事者似也未曾明確區分兩者。

² 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30-234；潘光哲，〈《時務報》和它的讀者〉，頁60-83；潘光哲，〈開創「世界知識」的公共空間——《時務報》譯稿研究〉，頁1-18。潘光哲兩文，後改寫入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第4章，頁170-212。

期歷史，遂大致呈現一個環繞著《時務報》，齊頭並進地趨向「近代」的過程。³本文討論的中心，是此期辦於杭州的《經世報》，據筆者所見，除聚焦於報文反映的章炳麟(1869-1936，浙江餘杭人)、宋恕(1862-1910)、陳虬(1851-1904，溫州樂清人，但世居同府之瑞安縣)等參與者個人思想的研究外，該報本身甚少引起關注。⁴這應與其持續時間不長有關，⁵而筆者之意，亦不在以此顛覆《時務報》的地位，而是將該地位進一步歷史化，透過揭示《經世報》的「內外史」——內容形式及其接受，與具體的流通情形，檢視現時以《時務報》為核心的討論在當時情境中的適用範圍，析論可能溢出該範圍的若干時代面向。故而這更似一則補充性的考察，藉以進一步反思維新報刊史中的「代表」與其所代表的具體連結，及此「傳媒」變遷與近代「思想史」的關聯。⁶

³ 通常的維新報刊系譜，首為《萬國公報 / 中外紀聞》與《強學報》；次為《時務報》；再為其他士人所辦各報，有時《知新報》、《國聞報》、《湘報》、《湘學報》等單列或作為眾報中之重點。這一系譜或許是承自戈公振的著作，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123-154。

⁴ 對該報本身的研究，參見湯志鈞，《戊戌變法史》，頁237-240；徐運嘉、楊萍萍，〈清末杭州的三種報紙——《經世報》、《杭報》、《杭州白話報》〉，頁132-139；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頁499-520；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頁150-152。另如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頁82-91、102-138，在列舉維新報刊時似未提及《經世報》。

⁵ 今所見《經世報》首冊為光緒二十三年年七月(1898年8月)出刊，最後一冊為第16冊，時間為同年十二月(1898年1月)。筆者所見《經世報》紙本，主要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第1-9、13、15-16冊，及浙江圖書館，第1-5、12-13、15-16冊。另，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有第1-9、13-16冊。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http://www.cnbkisy.cn/home>，檢索時間：2015年3-4月。所缺第10-11兩冊篇目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卷1，頁838-841。而章炳麟、宋恕、陳虬等人在該報所登文章，已被收入各自的文集，本文將直接引用刊載《經世報》之原文。民國時期尚有一北京《經世報》，鼓吹孔教運動，與本文所論晚清杭州《經世報》應無關聯。

⁶ 另有學者主要從公共輿論或政論的角度探討近代報刊史，近年代表性的

二、辦報緣起

《經世報》的籌辦者是兩位浙江士人胡道南(1862-1910, 紹興府山陰縣人)與童學琦(1868-1939, 紹興府新昌縣人), 二人同於光緒十五年(1889)中舉。此二人於維新時期與友人議及在省會辦報之事, 眾友的反應不一。與之同年中舉的山陰人徐維則(1867-1919), 便稱「廣設報館, 多譯外報, 總於風氣有益, 不敢以為不然」。⁷浙江東陽人吳品珩(1859-?)得知此事, 亦「力贊其成」。⁸而胡、童從一開始, 就希望獲得上海《時務報》館經理、且一樣有「同年」之誼的汪康年(1860-1911, 浙江錢塘人)的支持。徐維則在致汪的信中便說, 童學琦擬設報館之「編譯大旨, 悉遵貴館之式, 惟購譯外報、發售各埠一切章程, 務求指教」; 且童已定於「月內東裝赴申, 面懇清誨」, 囑徐維則「先達微忱」。信中還提及由汪代請羅振玉(1866-1940, 生於江蘇淮安, 祖籍浙江上虞)任報館主筆,⁹然羅之後在滬參與創辦《農學報》, 徐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三月致汪的信中亦提及此事, 似表明此議未成。¹⁰

個案研究有洪九來,《寬容與理性——《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1904-1932)》;唐小兵,《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為例》;唐海江,《清末政論報刊與民眾動員——一種政治文化的視角》;李金銓編著,《文人論政——民國知識分子與報刊》。

⁷〈徐維則致汪康年書〉,第2通,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1897年4月16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519。

⁸〈吳品珩致汪康年書〉,第2通,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896年12月6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冊,頁343。

⁹〈徐維則致汪康年書〉,第1通,日期不詳,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519。

¹⁰〈徐維則致汪康年書〉,第2通,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1897年4月16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519。

另一面，同屬紹興府山陰縣(今屬杭州蕭山)的湯壽潛(1856-1917，1888年中舉，1892年進士)，則對辦報明示反對。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稱，光緒二十二年冬(1896年底或1897年初)，童學琦即有意「創報於浙中」，湯氏「以人、地、時無一相宜，苦口危詞，覆書力阻……童君長者，更事太少，有沮之者，即智盡能索，有勸之者，又興高采烈」，辦報之事「自冬徂春，三起三眠，確聞其已作罷議，聘宋君而覆之矣」，之後卻又「此灰復燃，……賃居定局，皆月初事」(應指二十三年五月初)。湯氏「深懼其為商報之續，欲開風氣，而返於風氣」，他希望汪作書「曉譬利害，冀可中止於什一，不宜坐視其握蛇騎虎而嘿不一言也」。¹¹在他看來，士人辦報不得「返於風氣」，否則不如不辦，這一明確高於對「商報」的期許，或許同樣是建基於其已有的閱報經驗，以及對報刊媒介為「士林」所用之積極意義的體認之上。

上引信中的「宋君」，即浙省溫州府平陽縣人宋恕，於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897年3月22日)前被胡道南與童學琦聘為館中撰述。¹²就功名而言，宋僅為增生，但他早先師事同省名儒俞樾(1821-1907，浙江德清人)，並在上海、天津等地長期活動。其間宋對近代報刊已有接觸與瞭解，在光緒十八年(1892)撰成的《六字課齋卑議》初稿中，他言及各縣設議院之事，稱院中「議紳生……不給薪水，令開報館，賣新聞紙」，¹³表明在他看來，開報館可以成為「議紳生」一種正當的謀生手段。後來還稱：「自強之源在學校、議院、報館。夫學校、議院，

¹¹ 〈湯壽潛致汪康年書〉，第4通，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1897年6月16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3冊，頁2211。

¹²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卷15，〈日記1894-1911〉，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897年3月22日)，頁118。

¹³ 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初稿)》，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21。

權不在士；報館則士與有責焉。」¹⁴然而光緒十八年，王韜(1828-1897)據其《六字課齋卑議》作〈書後〉登於《申報》，¹⁵則令他大為光火，在兩年後致親友的信中，屢次抱怨王氏「未按原文」、「不解經濟」，對他的著作「謬加揚抑，毫不中要」。¹⁶這番的不愉快，或也影響到他此期對於報務的態度。二十三年二月廿七日(1897年3月29日)，在回覆胡、童的信中他坦承「生平未曾學作報紙文字」，惟因「貴報宗旨大異俗報、兩公志趣大異俗士之故」，方才「樂於從命」。儘管如此，他仍要求於「主筆」前加一「權」字，¹⁷且與首倡者訂有「條約」，稱在首冊報端，「本權主筆務登告白聲明，除所著論說外，餘事一切不稍與聞」；以後「如果喜觀鄙論者多，因之報冊風行，其時方敢正主筆之名，受關書，稱脩金」。¹⁸足見他雖同意受聘，卻在「報冊風行」之前，甚為在意自己的局外人身分。

除宋恕外，受聘撰述者尚有章炳麟與陳虬。其中章氏因與康門師徒的矛盾，於二十三年三月間自《時務報》館出走。¹⁹而章對宋印象較佳，據其後來憶稱，當時在滬有交往的諸人中(尤其是相對康梁)，「唯平子(即宋恕)與樂清陳黻宸(1859-1917)介石持論稍實。」²⁰二十三年六月

14 宋恕，〈《自強報》公啟〉，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260。

15 王韜，〈書宋燕生《六字課齋卑議》後〉，《申報》，1892年9月18日，第1版。據王所述，當時是宋主動將書給他過目的。

16 宋恕，〈又致定夫書〉，光緒二十年七月八日(1894年8月8日)；〈又致張季直〉，光緒二十年七月八日；〈又致定夫書〉，光緒二十年七月十六日(1894年8月16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10-511、513。

17 宋恕，〈致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97年3月29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69-572。

18 宋恕，〈應《自強報》主筆之招條約〉，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261-262。

19 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頁41-43。

20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頁5-6。按陳黻宸實係瑞安縣人，章

間(約 1897 年 7 月上旬)，章寫信勸宋「為浙學大局起見」，對受聘報館一節不要有顧慮，又提到宋的姻兄、溫州府瑞安縣學者孫詒讓(1848-1908)與自己的通信，稱孫「於廓清康學不遺餘力，度君亦有同志」。他在信末甚至說：「昔粵寇時，江浙遺老日夜望曾文正(曾國藩，1811-1872)一來，麟之重君，蓋亦如是！」²¹似有徑將粵人康、梁比作咸、同年間「粵匪」(太平軍)的意味。之前的二十二年五月間(約 1896 年 6-7 月間)，宋恕與梁啟超(1873-1929)在《時務報》館發生爭執，此後雙方開始疏遠；²²於是章的這段話便得到了宋的應和，後者在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897 年 7 月 14 日)的回信中稱自己與友人孫寶瑄(1874-1924，浙江錢塘人)等「大為執事不平，極望別樹正旗，摧彼驕敵」。²³次日，宋在致胡、童的信中即稱：「吾輩將為神州挽回薄俗，第一在去浮崇實，復三代直道，……磊磊落落，獨往獨來，方與夫己氏輩不同。」²⁴表明此時於省城另設報館，應可為這些浙人提供在思想學術上正本清源、壓制「夫己氏輩」的機會。

由是觀之，該報在籌辦伊始，參與者對於報刊方針的認識，即與

氏在此或是將之與樂清人陳虬混淆(陳虬與陳獻宸過從甚密)。

²¹ 章炳麟，〈致宋燕生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1897 年 7 月)，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73-574。

²² 宋恕，〈致飲冰子書〉，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1899 年 9 月 23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601-602；〈丙申日記摘要〉，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896 年 7 月 4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下冊，頁 936。另對《時務報》有重要影響的吳樵(1866-1897)，亦與宋關係不佳，見〈吳樵致汪康年書〉，第 3、14 通，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 年 12 月 27 日)、日期不詳，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 1 冊，頁 461、494。

²³ 宋恕，〈覆章枚叔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897 年 7 月 14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72。

²⁴ 宋恕，〈又覆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1897 年 7 月 15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74。

上海《時務報》存在一定的正負關聯。在經營一面，首倡者頗有意援用《時務報》館經理汪康年的人脈與經驗；但在報文取向一面，聘請的三位撰述，至少有兩位對《時務報》抱持敵意。至於陳虬，其早年亦曾往來杭滬之間，在光緒二十年(1894)刊刻的《利濟教經》中亦已明言：「興亞洲，入手方：設報館，開學堂。」²⁵對辦報的積極意義有充分的認識。二十三年初，他與友人在溫州府城創辦《利濟學堂報》，曾致信託汪康年代售該報；²⁶到二十四年(1898)，還曾列名康有為等牽頭的保國會，²⁷並積極籌建「保浙會」，以期與保國會相呼應。²⁸因此，他似對汪及康、梁均無成見，可推測其受聘，雖應是與宋恕同鄉，或與胡、童同年中舉的緣故，²⁹但他是否明瞭宋、章以康、梁為假想敵的撰作旨趣，則尚屬一問題。

據宋恕稱，該報原議稱「興庶報」，後為求「淺顯」，改稱「自強報」；³⁰而據蔡元培(1868-1940)的記錄，該報似又曾擬「實事報」之名，至二十三年六月九日(1897年7月8日)蔡收到胡道南的信，則稱已易名

25 陳虬，《利濟教經》，收入胡珠生編，《溫州文史資料第8輯·陳虬集》，頁131。

26 〈陳虬致汪康年書〉，第4通，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1897年6月18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2001。

27 〈浙江孝廉陳虬等呈請總署代奏摺稿〉，《知新報》，第55冊，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頁7-9。該文曾轉載於《湘報》第106號，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第2-5版。

28 〈京城保國會題名記〉，《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5月14日)，第1版。

29 另宋恕還曾借溫州士子赴杭鄉試之機，向章、胡、童推薦陳虬的胞侄陳明(字宗易)。宋恕，〈又致章、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897年8月8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82。

30 宋恕，〈《自強報》序〉，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257。另，孫寶瑄透過宋恕結識童學琦，亦稱其「欲創《自強報》館」，見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1897年3月16日)，頁80。

「經世報」。³¹同年七月初刊出首冊，「逢五出報，每月三冊，」³²但首期實際可能在七月初十日(1897年8月7日)面世，³³與《時務報》等同為旬刊。其館址設於杭州上扇子巷，據之後所登「本館撰譯諸君名氏」，館中編撰人員基本為浙籍，亦有外省人士。³⁴除宋恕、章炳麟、陳虬為撰述外(宋恕後又改稱「攝著論」)，³⁵尚有館外撰述瞿昂來(江蘇寶山人，號「蓬生館主」)、董祖壽(浙江秀水人)。英報翻譯為吳應時(安徽休寧人，號「曾游英島客」)，法報翻譯為「壽護室主」(又號「三渡重洋客」，真名不詳)，³⁶兩位翻譯據稱均有隨使出洋經歷，雖「皆不能駐局」，所幸均在杭州，「離館尚不甚遠，無所不便」。³⁷日文翻譯則「因經費支絀，且為緩圖」。³⁸自第11冊(丁酉十月中，1897年11月)起，法報改為黃炳榮(浙江慈溪

31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卷15，〈日記1894-1911〉，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九日(1897年7月8日)，頁134。

32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32。

33 〈宋恕親友函劄·童學琦等〉，第5通，光緒二十三年七月朔日(1897年7月29日)，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316。

34 〈本館撰譯諸君名氏〉，《經世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年8月)，頁30。

35 宋恕，〈又覆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1897年7月26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7。

36 按編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王錫祺(1855-1913)，字壽護，是否即「壽護室主」，尚未見確據。另胡、童致宋恕的信中曾稱，館中訂定英、法文翻譯各一人，「法譯吳姓」或即江蘇嘉定人吳宗濂(字挹清)，見童學琦、胡道南，〈致宋燕生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日(1897年7月9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5。《經世報》刊載大量他的文稿，但署名均作吳宗濂或吳挹清。因此「壽護室主」也可能是吳宗濂。

37 童學琦、胡道南，〈致宋燕生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日(1897年7月9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5-576。

38 〈宋恕親友函劄·童學琦等〉，第6通，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十日(1897年8月7日)，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316。

人)翻譯，壽護室主「勘定」。³⁹

三、空間問題——杭滬之間

《經世報》的「外史」，關乎「空間」問題，即該報館所處位置及與其他地域人員或報刊的互動，反映出該報如何定位走向，以及對其發行運營有何影響。

因《經世報》館址設於浙省省會，其發行渠道即分「本省」與「外省」兩種。首冊至第4冊(丁酉八月上，1897年9月)所列本省售報處，涵蓋杭州、寧波、溫州、紹興、金華、台州、嚴州、湖州、嘉興等府城及部分屬縣縣城，縣以紹興府為最多，有山陰、餘姚、諸暨、嵊縣等，這一點或與首倡者係該府人氏有關。至於浙西南部通常被認為最僻遠的衢、處二州，則未有代派處。第1至4冊所列外省售報處，則包括京師、濟南、福州、安慶、蘇州、江寧、南昌、西安、廣州等行政中心，天津、上海、漢口等通商大埠，及蕪湖、常熟、宜昌等地，亦多在沿海或長江流域。而第3冊中，有讀者來信稱「不宜列安慶、西安二處」(未詳何故)，報館答應削去，但實際並未照辦。⁴⁰

在這些省外地區中，上海無疑相對最受重視。如《經世報》首冊封面，即特地標出「上海分館在新馬路福海里謝寓」字樣。實際上，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1897年7月10日)信中胡、童二人即欲借宋恕身在滬濱之便，託其在《申報》、《蘇報》等報上登載創刊告白；⁴¹宋不

³⁹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卷1，頁839。

⁴⁰ 〈答友人議本報體例書〉，《經世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年8月)，頁30。

⁴¹ 童學琦、胡道南，〈致宋燕生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日(1897年7月9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6。光緒二十三年七月朔日(1897年7月29日)信中，胡、童復請宋恕在「上海同人中」「廣為吹

僅應允，還提議待六月十七至十九日(7月16-18日)於《申報》登過，「再送登《新聞報》，似較同日登為妙」。⁴²只是登出來的效果，宋不甚滿意，其中《申報》只同意登在論議之後，「其第三天乃登諸附張，須細檢乃見」。而《新聞報》於六月廿二至廿四日(7月21-23日)登論前告白：「登價貴極，乃第一天竟脫排『經館』兩字，往囑，於二、三天補足，並聲明『但肯補足，而不肯聲明』，架子大極！」⁴³翻查原刊，兩份報紙所刊告白大致如宋所云，《申報》位置太過靠後，與商業廣告混跡一處；《新聞報》排版較為草率，且未突出標題，難以引起讀者注意。⁴⁴此外，《經世報》還曾與一些士人報刊共用銷售網路。如在該報首冊登有上海《新學報》公啟，⁴⁵此後報中代售數種報刊，包括《利濟學堂報》、《萃報》、《實學報》與《算學報》。前述《經世報》

噓」，見〈宋恕親友函劄·童學琦等〉，第5通，光緒二十三年七月朔日(1897年7月29日)，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316。

⁴² 宋恕，〈又覆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1897年7月15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5。

⁴³ 宋恕，〈又覆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1897年7月22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7。

⁴⁴ 《經世報》在《申報》的告白，見〈新出《經世報》〉，《申報》，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97年7月16日)，第4版；《申報》，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1897年7月17日)，第5版；《申報》，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1897年7月18日)，第9版。《經世報》在《新聞報》的告白，見〈新出《經世報》〉，《新聞報》，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廿二至廿四日(1897年7月21-23日)，第1版。兩處文字基本一致，但《新聞報》告白首日「世報館同人公啟」前脫一「經」字，後二日即補上。

⁴⁵ 〈《新學報》公啟〉似係宋恕聯絡刊登，後胡、童托宋恕聯繫《新學報》館代派《經世報》，見〈宋恕親友函劄·童學琦等〉，第5、6通，光緒二十三年七月朔日、十日(1897年7月29日、8月8日)，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315-316。

溫州地區代派處，即此《利濟學堂報》館。⁴⁶《算學報》是宋恕同鄉黃慶澄(1863-1904，溫州平陽人)所辦，原設溫州，後在上海設有分館。《萃報》、《實學報》、《新學報》則均辦在上海，《實學報》館為《經世報》在滬的代派處之一。可見除與溫州的聯繫關涉與事者的「鄉誼」外，其所共用的銷售網路，仍以上海地區為核心。當然，此一規模與《時務報》相比尚有差距，且未見《時務報》刊登《經世報》的告白，而《經世報》上似也無代賣《時務報》的紀錄。

相應地，《經世報》也採用過一些當時流行的促銷手段，其重點對象則是杭州本城的讀者。如首冊告白中即規定：「全年先交費者四圓，按季交者四圓五角，本城零售，每冊一角五分，外埠概不零售。」且本城人氏到館購報，可享九折優惠。⁴⁷有讀者來書建議外埠同樣零售，該報則以「將來零續添印，甚為費事」為由回絕。⁴⁸另外，報中告白原稱「時文試律」不予登載，似為支持科舉改革；⁴⁹但 1897 年適逢鄉試年，該報也曾利用此各府士子麀集會垣的機會作推銷。⁵⁰只是科舉制對於報刊仍是一把雙刃劍，如有讀者來書稱，報中字體宜由楷體改宋體(這一建議或同樣有向《時務報》看齊的意味)，卻得到答覆：「近日書坊刻家趕葺場屋書籍，能寫宋體者幾於聲價十倍。……[科考放榜後]則

46 〈《利濟學堂報》告白〉，《經世報》，第 9 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下(1897 年 10 月)，頁 27；另，〈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12 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下(1897 年 11 月)，頁 1，稱：「本館發第十期報時，有第十期《利濟報》二本誤入。」似可說明二報確曾捆綁銷售。

47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1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 年 8 月)，頁 32。

48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3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 年 8 月)，頁 30。

49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1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 年 8 月)，頁 32。另與《時務報》等類似，館中代售有關策論訓練的書籍，如《萬國時務策學大全》等。

50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3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 年 8 月)，頁 30。

朱卷市又起，只得緩俟。」⁵¹

近期有學者指出，維新時期士人報刊的推銷，尚頗依賴基於個人交誼的代售，據今日標準來看，顯然不夠「正規」。⁵²《經世報》在此方面亦不例外，代售報刊者正是「折扣」的重點對象，「每收費十圓，贈銀二圓，售至五十分以上，每分每年均作三圓計算」，惟郵費須「代售者自給」（較遠的外省寄費每冊加2至6分）。⁵³故此期的報務形態，充其量只能算作某種「準市場化」：儘管曾在商報上做廣告，並採用一些促銷手段，但許多派報處僅是官紳個人所在，而非市場化運作意義上的經銷點。然而相應地，未與《時務報》共用銷售網路，並不表示《經世報》的運營未曾參考《時務報》；相反，對於《時務報》獲得官紳大力贊助，《經世報》也曾明示效仿之意。如第4冊告白中即稱：

上海《時務報》既荷各省當道及諸有力者資助提倡，得以風行海宇，本報意亦在推廣見聞，講求經濟，倘謬蒙許可，辱承惠賜，當將姓氏爵里刊登報冊，其資儲為公積，決不私肥，凡助至百元以上，按期送報，所刊圖籍均送一分。⁵⁴

即主事者對《時務報》成功之道的理解，仍偏向於官府提倡與有力官紳捐助（尤其在起始階段），而非售報本身。再結合當時並不罕見的辦報「非逐市利」的自我標榜，⁵⁵這一點，或也正被某些與事者建構為士人辦報與以往商報的一大區別。⁵⁶

51 〈答友人議本報體例書〉，《經世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年8月），頁30。該刊直到終刊，未再更換字體。

52 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下冊，頁462-467。

53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32。

54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4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上（1897年9月），頁1。

55 宋恕，〈《經世報》敘〉，《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7。

56 現有研究者以《時務報》為主要例證，強調維新時期新式傳媒開始了「政

麻煩在於，對此區別有意無意的強調，與報刊攸關的地理空間及主事者的官紳「人脈」之問題相結合，便會對報務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如上所述，《經世報》的經營，滬杭兩地並重，即在上海做廣告，在省城主銷售。⁵⁷但因多是館外甚至異地供稿，館中便曾因「撰譯諸君寄稿，數被信局延閣(擱)」而逾期出報，報館只得登出告白致歉。⁵⁸當然，延期出報原因甚多，在當時尚屬常見現象；而杭、滬極近的距離，使《時務報》等滬報的影響範圍可以涵蓋浙省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省城)，杭州報刊獲取最新資訊的劣勢遂成問題。

此問題較明顯反映在該報的譯稿上。這些稿件據稱是譯自 10 多種英法文報刊，⁵⁹可是多數外報之獲得，上海似乎皆早於杭州。早先

治化」，以說明何以之前「商報」興起未能帶動士人全面介入報務，見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頁 97-151。

⁵⁷ 另在稿件來源上，胡、童二位在杭的經營者，亦曾於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1897 年 7 月 18 日)致信裏校滬上求志書院課卷的宋恕，請其遴選一些課卷，寄來作為報中稿件，結果七月初七日(8 月 4 日)宋以己「代閱」、「與經管者蹤跡甚疏，呼應不靈」為由回絕。見〈宋恕親友函劄·童學琦等〉，第 2 通，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 314-315；宋恕，〈又覆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七日(1897 年 8 月 4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81。

⁵⁸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4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 年 8 月)，頁 1。

⁵⁹ 這些外報有：《中法新彙報》、英《泰晤士報》、《字林西報》、《英京自立報》、法《巴黎時報》、《英華政報》、《倫敦星期法文報》、《英華郵報》、《法國新報》、《巴黎礦務報》、《英華捷報》、《倫敦農學報》、《法國農學報》。上述諸報已去掉了一些可能重複的刊名，如《法國時報》、《巴黎時報》、《法國巴黎時報》似為同一報刊；《倫敦星期法文報》、《倫敦法報》、《倫敦法文報》、《倫敦星期法報》也應為同一報刊，另《倫敦格致報》或即《倫敦星期法報格致餘談》。當然此處所列刊名可能仍有重複，只是限於材料，無從詳考。另孫寶瑄曾為《經世報》讀者，引及該報譯稿提供的資訊，與華籍記載相合，見孫寶瑄，《忘山廬

徐維則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已說明，「譯館一節」之所以要「奉教於閣下」，緣由之一便是「恐彼此複重，閱者生厭，況西報甚多，何必爾爾」；可「今誦來書，人言如是，頗為閣下憾之」，⁶⁰猶見譯稿一事未獲解決。更明確的例證，如《經世報》首冊告白中稱：「本館英法各報，購自外洋，尚未寄到，暫就友人處借得數種及上海現有者譯登。」⁶¹不久有讀者來書提議：「每期編定未印之先，宜遍查他報譯文，凡與相複者悉去之。」得到答覆：「滬上得西報較早，本館見滬上報較遲，容有不謀而合，無從逆避，其見及者自當檢去。」⁶²兩冊過後，復有讀者建議「登譯文宜有抉擇」，館中人僅答以「敬佩」二字了事。⁶³

在今日看來，轉載資訊上的些許重複，應是平常之事；惟因事屬初創，當時士林讀者對於自辦報刊數量的期許，似乎本不甚高，對於「複重」的容忍度也不會太高。如學者曾提及，當時不少讀者曾致函汪康年，希望《時務報》能保留「上諭」專欄，理由是如此一來，讀者就不必「遍閱各報」，以減輕經濟與精神上的負擔。⁶⁴《經世報》地處上海之外，卻又位於滬報的核心影響範圍內，這種一報在手即可解決知識資訊攝取問題的讀者訴求，在相當程度上便降低了該報廣為流佈的可能性。

再論人脈，如上文所述，目前可確考的是利用經營者乃至幾位館

日記》，上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頁149。

⁶⁰ 〈徐維則致汪康年書〉，第2通，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1897年4月16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519。

⁶¹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32。

⁶² 〈答友人議本報體例書〉，《經世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年8月)，頁30。

⁶³ 〈答友人議本報體例書〉，《經世報》，第5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中(1897年9月)，頁1。

⁶⁴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頁186-187。

中撰述的省府同鄉、科舉同年網絡。另如館中代售《實學齋文編》，係「杭郡諸生講求時務之作，由林迪臣(杭州知府林啟，1839-1900)太守選定發刊，每季一冊，仿《格致彙編》例也」。⁶⁵代賣杭州知府林啟選編之書籍，或許即為換取本地官員的支持。類似的舉措，還有第2冊刊出的〈杭州府林太守啟招考求是書院學生示〉、〈求是書院章程〉等，⁶⁶此後陸續刊登省府以至外省的官方文書。館中還代銷杭州詒經精舍主講俞樾的文集《春在堂全書》，則可能與宋恕、章炳麟曾在杭師事俞氏有關。惟該報的兩位主要經營者僅舉人功名，未如汪康年曾中進士(1892年)，並在京師發展出廣闊的官場人脈，為《時務報》所運用；亦未見兩人有供職倡言洋務的封疆大吏(張之洞，1837-1909)幕府的經歷，其個人關係網被藉以打動「諸有力者」的可能，也只能更小於汪氏主持的《時務報》。

綜合上述「外因」，足以對《經世報》的運營前景構成極大的挑戰。從首冊至第16冊，該報固然取得了一些官紳資助，然數額甚為有限，官紳捐款高潮可能早已集中於《時務報》(尤其是在江浙地區)。⁶⁷相比之下，《經世報》創刊不久後，銷量即已呈下滑之勢。與胡道南同鄉、當時可能在京的蔡元培，曾受託代銷該報，其日記中稱，二十三年七月廿九日(1897年8月26日)由胡處寄來首冊百本，但至十月十五日(11月9日)，第7至9冊各只寄50本；十二月五日、十日(12月28日、

⁶⁵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30。

⁶⁶ 〈杭州府林太守啟招考求是書院學生示〉、〈求是書院章程〉，《經世報》，第2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中(1897年8月)，頁2-6。

⁶⁷ 筆者統計該報中刊載的官員士民的助資，總計418元。這數額或許不完整，但遠高於此數的可能性應也不大。而光緒二十二年五月至十二月《時務報》所收捐款為9,315.7元，二十三年七月至十二月所收捐款已降至1,460.4元，見廖梅，《汪康年》，頁62。

1898年1月2日)，第11至13冊各只寄25本。⁶⁸這一方面可能因蔡的代銷熱情下降，另方面《經世報》本身印數也可能不斷減少。再者是派報點的減少，如第9冊所登代派點，本省只剩下省城、寧波、溫州、金華蘭溪、紹興數處。外埠分售處尚無大的變化，其中如上海，有《實學報》館、譯書公會、千頃堂、著易堂書坊等數處。至第12冊復刊出告白：「本報江蘇分派處，以常熟醉尉街張宅為總匯。」⁶⁹第13冊則言：「本報上海一埠，現托寓石路福星公客棧陳君叔濤經理以外，上海售本報及《利濟學堂報》處，如須增減數目，請告知陳君可也。」⁷⁰至第15冊「上海四馬路石路吉陞棧內陳寓」已成「經理分售處」，而不見其他銷售處。⁷¹僅管這些代派處資訊可能不完整，但大致能反映外埠銷售規模同樣萎縮的態勢。

對此，主事者也曾有應對措施。同年九月間，外界有調湯壽潛總理《時務報》之議，九月二十日(10月15日)胡、童在致宋恕的信中便提及湯「近在省中」，欲趕在其受聘《時務報》館之職前，挖角到《經世報》館，借其遊幕經歷與進士功名所積攢的名望重振報務，叮囑宋恕「幸勿告人」。信中還稱：「銷數尚難約計，每期可發者不過八九百分，情形雖難支援，然不敢退沮，冀有扶翼之者……本省已托設法，他省亦發數信，大約必得一當，千萬勿告人！」⁷²挖角一事很快沒了下文，但後來的《經世報》第14冊，於卷首刊登〈江蘇藩司聶發各屬

68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卷15，〈日記1894-1911〉，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廿九日、十月十五日、十二月五日、十日(1897年8月26日、11月9日、12月28日、1898年1月2日)，頁137、149、154。

69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2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下(1897年11月)，頁1。

70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3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上(1897年11月)，頁1。

71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5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下(1897年12月)，頁1。

72 〈童亦韓、胡鍾生來書〉，第1通，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1897年10月15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86。

《經世報》並飭轉頒紳董及書院士子劄》中謂：

茲據浙江《經世報》館函稱，吳中風氣較開，又新辟租界，聞見日擴，將所印報冊匯送前來，本司詳加披閱，其採取各國政教以及中外近事，足資考究，於經世之學，不無裨益，堪與《時務》、《農學》等報相頡頏。自應剴發各屬，分頒傳覽。⁷³

這或許便是「他省亦發數信」的結果，表明在主事者看來，依託官場而非市場的手段，方有應急之效。然而，地處浙省的報刊，卻由蘇省大員出面「救場」，不免與前述以本省人為主要讀者群的規劃有些脫節。

至於效果，目前僅知第 16 冊尚有告白：「本館近因撰譯各稿紙積盈寸，篇葉有限，致同人投贈之作，不克備登，實為歉悚，謹俟明年陸續刊佈以後，仍望諸君勿吝賜教，源源寄示，是所盼幸。」⁷⁴雖稱明年還要續辦，然在該冊之後《經世報》似已停刊。

整體看來，在「外史」方面，《經世報》主要依託本省本城的官場士林人脈，又將近代報刊最集中的上海視為理所當然的發展中心。此做法在當時並非孤例，⁷⁵問題在於士人報刊一時蔚起，形成的卻是一個供過於求的「準市場」：一方面，引入的一些市場手段，無法取

⁷³ 〈江蘇藩司聶發各屬《經世報》並飭轉頒紳董及書院士子劄〉，《經世報》，第 14 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中(1897 年 12 月)，頁 1。江蘇藩司聶應即江蘇布政使聶緝槩(1855-1911)。

⁷⁴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16 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1898 年 1 月)，頁 1。

⁷⁵ 如湖南《湘學報》、溫州《利濟學堂報》等，亦頗重視以上海為關鍵點向全國推廣。而遠在天津的《國聞報》及配套的《國聞彙編》，在發行運營上，欲發展中國南部市場，同樣有意借重《時務報》的影響力，及經理汪康年的人脈與經營經驗。見〈王修植致汪康年書〉，第 7 通，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七日(1898 年 2 月 27 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 1 冊，頁 82；〈嚴復致汪康年書〉，第 2 通，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97 年 8 月 22 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 4 冊，頁 3274。《國聞報》與《時務報》諸人的多方互動，參見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頁 282-286。

代對官府提倡及官紳捐助的依賴，故對報刊的盈利面向並無明確肯認；⁷⁶另一方面，讀者對自辦報刊種數的需求尚小，導致官紳的注意力仍多集中於《時務報》，及得到該報傾力推介的個別名報(如《知新報》、《農學報》等)，由此，鞏固了以《時務報》為中心的銷售網絡。而該網絡的邊緣以及與其中心無交集的報刊，則復因商業面向鮮受認可，分流作用變得愈發有限。《經世報》主事者個人官紳人脈(尤其是官場人脈)的劣勢，亦頗易轉為報刊的競爭劣勢。而且相對《湘學報》、《國聞報》等尚可立足於其他區域，《經世報》不甘自限一隅，卻又必須應對與滬報的全面競爭，更不時讓主事者感到困擾。⁷⁷介入該報報務並同時主持溫州《利濟學堂報》的陳虬，便曾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慨歎：「想貴報外，無一報不折本。」⁷⁸結合前文分析，士人報刊其時已次第興起，《時務報》卻仍近乎一枝獨秀，似也是合乎情理的了。

⁷⁶ 若只算銷售收入，《時務報》同樣存在巨額虧空，只有加上捐款，才能大致平衡收支，見廖梅，《汪康年》，頁 65-66。《經世報》同樣面臨虧空，其很大程度上是拖欠報資所致，見〈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9 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下(1897 年 10 月)，頁 27。

⁷⁷ 1897 至 1898 年杭州另有日報《杭報》，更具商業性、迎合市民口味，而稿件來源亦多與上海相關，參見徐運嘉、楊萍萍，〈清末杭州的三種報紙——《經世報》、《杭報》、《杭州白話報》〉，頁 135-136；浙江省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新聞志》，頁 134。一說《杭報》與日商《杭報》不同，後者在甲午戰爭「案懸未結」時已開辦，見項士元，《浙江新聞史》，頁 15。但該書有許多錯誤，如稱《經世報》為月刊，故此說只能存疑。筆者在浙江圖書館、浙江檔案館均僅見《杭報》，第 3、4 號，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廿六、廿七日(1897 年 8 月 23、24 日)微卷。

⁷⁸ 〈陳虬致汪康年書〉，第 3 通，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898 年 2 月 10 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 3 冊，頁 2001。

四、體例問題與「經世」傳統

《經世報》之「內史」，即體例與內容。其中，體例為「內史」之一亦事出有因。前引關於《經世報》的研究，均以為該報「內容駁雜」，所歸納的理由，多是報中論議重點間的自相矛盾。這種判斷似多屬後見之明，且如《時務報》等名報，也未嘗沒有興／抑民權之類論點的前後矛盾。⁷⁹倘若回歸歷史情境，《經世報》的內容問題，首先應與其「體例」密切相關。

《經世報》的體例，應始於館中撰述宋恕的意見。宋所擬的《自強報》體例，分皇言、政事、文史、新學、異聞、本館論說，計 6 綱 29 目。⁸⁰刊名改《經世報》後，似又採納了湯壽潛等人的意見，⁸¹改為皇言、庶政、學政、農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館論說 12 綱，以下不再分目(另含附錄)。⁸²儘管前後 2 種方案不盡相同，但一致的是，相較《時務報》在內的按論議、

⁷⁹ 當時辦報士人也有意於報中討論爭議的事件，如「農政」一門曾刊載〈山陰山西閘圖說〉(紹興中西學堂供稿)一文，附編者說明：「本期所印山西閘圖說，因議論不一，冀昭眾睹，而衷一是。……山陰山西閘，湮沒已久，或言當開通閘道，以復舊制，或言今昔形勢不同，開通更多窒礙，議論紛然，莫衷一是。茲經紹郡中西學堂詳測繪圖，於現在地勢，瞭若指掌，本館得之，用附報章，以供眾覽。」見〈山陰山西閘圖說〉，《經世報》，第 6 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下(1897 年 9 月)，頁 8-11。

⁸⁰ 宋恕，〈《自強報》序〉，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258-259。

⁸¹ 宋恕，〈又覆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1897 年 7 月 15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74-575。

⁸² 按《經世報》在《申報》與《新聞報》上的創刊告白，無「學政」而有「士政」，無「格致」而有「萬物實理」，這似為宋恕的意見，表明至二十三年六月底，報中專欄名稱仍在調整。見宋恕，〈覆章枚叔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897 年 7 月 14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73。

報譯(再分英、法、俄、日等語言種類)等體裁分類，此二者多半直接按內容分類，無關稿件本身的體裁。僅有「皇言」與「本館論說」2門，專列上諭與館中撰述之論議，體裁較為單純。

前述第2方案(後為實際採用)，所設類別多標以「政」名，亦是淵源有自。早先賀長齡(1785-1848)、魏源(1794-1857)等編《皇朝經世文編》的目錄編排，即是「學術」、「治體」兩門後，各標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之「政」名。至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其中「西政」一類下則使用了「農政」、「工政」、「商政」、「兵政」等名稱。《經世報》對此或有參考，然以「政」名為主，未如梁氏再分學、政、教(「教」類書實際摒斥未收)，有意強調各類「學」或知識資訊理應提升到「政」的高度，從而呼應刊名中「經世」一詞聯結「學」與「政」的思維模式。⁸³據筆者所見，當時主要按內容分類的士人報刊，尚有湖南《湘學報》、上海《新學報》等，逕以「學」分；而明標「政」名，與《經世文編》體例最接近者，則為《經世報》。可按內容分類便較有彈性，對此該報亦不諱言，「通論各政及官制吏治與夫部臣疆臣所有事者」均入「庶政」，而「學政等亦庶政之一門，以茲事體大，故別出」；另有「通論無可附麗者」，被歸入「通人著述」，可被視為「專門」者則「入以上各目」。⁸⁴

對此分類的主觀性，也有讀者提出意見，如第5冊中有人建議：

⁸³ 實際上，《皇朝經世文編》的六部分綱體例被全面打破，也是到1898年麥仲華等編的《皇朝經世文新編》，只是其中尚有「農政」、「商政」一些「政」的名稱，參見章可，〈論晚清經世文編中「學術」的邊緣化〉，頁68-74。《經世報》時間在前，但身為康門弟子的麥仲華等可能是直接參考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筆者未見其曾參考《經世報》的證據。見賀長齡、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梁啟超，《西學書目表》，下冊，頁1121-1158。

⁸⁴ 〈經世報敘例〉，《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3。

「『交涉』一門宜專錄中國與洋人交涉各事，無論鉅細，特設此門，以昭鄭重，至外洋交涉概入『中外近事』，以示區別。」但報館實未採納。而對於類別名稱，亦有讀者以為不妥，〈答友人議本報體例書〉中有人指出：「本報『通人著述』一門，『通人』二字推崇太甚，跡近標榜，且啟僂薄口實，宜改為同志近人等。」報館答覆：「欽佩無量，敬當於分卷時依改。」⁸⁵第9冊告白中即稱，「通人著述」一門，「當時因此門篇葉尚少，故未通改。自本期起，依《時務報》館、《實學報》館文編之例，改為『本館文編』」。⁸⁶自第10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上[1897年10月])起，與業界標竿更為接近的「本館文編」便取代了「通人著述」，與「本館論說」並存。

實際上，首冊所列類名也不是每期出現，而是視編者對稿件的理解而定。再專就宋、陳、章三撰述以外的論議文字而言，這樣的分法也導致此類稿件歸類的不確定性。其中李慈銘(1830-1894，浙江會稽人)當時已去世，其一份舊稿被歸入「通人著述」(第4冊)。英文翻譯「曾遊英島客」吳應時，亦有3篇論議刊登，被分別歸入「中外近事」(首冊)、「交涉」(第2冊)與「學政」(第5冊)。吳宗濂(1856-1933)同樣撰、譯或提供舊稿，1篇條陳入「通人著述」(第1-3、6-7、9-10、12冊連載)，其譯纂的〈隨軺遊記續集〉則在「附錄」從第4冊連載至12冊，第14冊又開始連載其〈隨軺遊記餘編〉，至16冊尚未續完，另一份譯稿則被歸入「交涉」(第7-8冊)。館外撰述瞿昂來所登的10篇稿件中有「交涉」2篇、「通人著述」2篇、「商政」1篇、「工政」1篇、「學政」1篇、「本館論說」3篇。同為館外論述的董祖壽，登有「學政」1篇、「格致」1篇、「通人著述」1篇、「本館文編」3篇。浙江上虞人許家惺(1873-?)，

85 〈答友人議本報體例書〉，《經世報》，第5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中(1897年9月)，頁1。

86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9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下(1897年10月)，頁27。

登有「學政」1篇、「興浙文編」2篇、「通人著述」1篇、「本館文編」1篇。另宗能述(會稽人)、紹興中西學堂各1篇，均入「農政」，馬用錫(1870-1900，會稽人，蔡元培表弟)「通人著述」、「本館文編」各1篇，徐維則、石麟「興浙文編」各1篇，周素(1856-1899，原名煥樞，浙江泰順人)「興浙文編」2篇，邵孝義(1874-1918，浙江仁和人)、噫時子(會稽人，真名不詳)、何炯(浙江瑞安人)均為「本館文編」1篇。大致到最後數冊，這些文稿的歸類才有向一些文編性質的專欄(如本館文編、興浙文編等)集中的趨勢。至於外報譯稿，則被認為與官方奏牘無甚差異，同被歸入各專門類別。

如此的分類，今日研究者不免據以認為「內容駁雜」，然回歸當時情境，《經世文編》攸關的編纂傳統，對該報的影響實不止於此。如在第3冊有讀者提議：「前期未完之條，後期續印，宜於闌外或上方或右邊，用細書注其題目，俾閱者便之。」自當冊起即獲採納(在闌外右邊作注)。可當有人建議「某類起處《經世報》幾之幾之語，不如題在中縫云云。」卻得答覆：「本報此語為將來分卷成書而設，不關宏要，中縫標明某類，似已便閱。」另有讀者的回饋，更生動地描述閱讀的不適感：「每期每類照行數割截，語氣未了，忽然中止，閱者多不愜意，且非報章體例，宜某類不能湊足行數者，空出二三行，如《時務報》刊譯報之例云云。」另有人稱：「如末葉末條稍短者，可用縮字法，俾一條刊完，否則擇其字數適如行數者補滿之云云。」報館對此二條統作答覆：

斟酌妥善，感佩無量，然有不能已於辦者，撰譯各件，隨到隨錄，勢難稽擇，且某類印若干葉，不克豫定，有如今日錄庶政類至若干葉，以為可止矣，而明日登件又至，故必須發印之日方可定

數，轉移之間，頗為費手，以後總當留意，不負教惠。⁸⁷

即主事者並不認為直接按行割截、中斷文意的連載是大問題，箇中要害在於明以報刊為分卷成書的預備階段，其辦刊目的乃是終刊或積累一段時間後，合成一套類於各種《經世文編》的報文彙編。可見《經世報》之後有彙編本刊出，並不足為奇。⁸⁸

擴大而論，如當時《時務報》刊行後，其內容也曾被人重新歸類，納入包括經世文編體在內的各種知識彙編；《國聞報》、《湘學報》等，今存世者即以彙編本較為常見。⁸⁹另如《利濟學堂報》的〈報例〉中也說：「各自為葉，隨報分編，以便閱報諸君將來裝訂成帙。」⁹⁰後來，該報即在分訂後，以《利濟叢書》（由「利濟講義」專欄匯訂）與《利濟學堂報彙編》（其他部分匯訂）兩種形態存世。⁹¹甚至報文的分類本身，也可能被視為次要問題，如黃慶澄之所以能以一己之力辦《算學報》，即在於將「辦報」等同於個人著書立說，惟邊寫邊印，或分章出版，最後再合為一部算學專著。⁹²在這些辦報士人看來，報刊這一新式載

87 〈答友人議本報體例書〉，《經世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年8月），頁30。

88 如胡珠生編《陳虬集》所刊陳氏在《經世報》的刊文，即錄自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經世報》彙編本。見胡珠生編，《陳虬集》，頁261-304。但筆者未在上海圖書館與徐家匯藏書樓見及此本。

89 按《國聞報》本是日報（報紙），且《國聞報彙編》（非《國聞彙編》）實為選編，與《湘學報》彙編之類又有不同。《國聞報彙編》原刊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3輯。

90 〈《利濟學堂報》例〉，《利濟學堂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大寒（1897年1月20日），頁1。

91 潘猛補，〈清末溫州三刊物〉，頁177。

92 黃慶澄在《算學報》完結後回溫，又辦有《史學報》，其第3冊起改稱《甌學報》，從今僅存溫州圖書館藏其第4冊，約略可見他仍將辦報等同於著書，只不過《甌學報》是刊出著數種書，邊寫邊出，最後分別合為幾部專著。該冊〈本局告白〉中稱：「現因各友函囑，將本報各稿先出完數種，

體本質上仍屬過渡，倘欲存世，尚須轉化為更一般的物質形態——專論或文集、文編性質的書籍。

關於維新時期報刊與書的關係與區別，近年學界圍繞《時務報》，業已提出了一些看法。如有學者指出，早先來華傳教士即把報刊譯作「書」，此對中國士人理解新型媒介應有影響；而考察維新期刊的面目(如版面、裝幀等)與體裁，當可發現其時效性與今日對報刊的要求尚有很大距離。⁹³另有學者引及十八世紀末的法國新聞工作者勒德雷(Pierre-Louis Roederer[1754-1835])的論斷，報紙(此處應也包括刊物)相比一般的書，乃是「主動地去逼近讀者」；且該學者專論《時務報》譯稿，稱這些新聞稿已明示了報刊的時效性特徵。⁹⁴大致說來，前者意見近於後見之明；⁹⁵後者則顯示《時務報》主辦者確已意識到報刊與書的某些不同，並相應地付出了可見的努力。本文則欲提示，「書」與「報」的同異，在當時的辦報實踐中尚有更為深入細緻的呈現。報刊的時效性在不少士人參與者看來，務必要為「書」的相對恆久性所覆蓋。換句話說，如論者所指出的，報刊所承載的資訊，不時被時人逕轉為更具恆久價值的知識。⁹⁶結合本文案例，其相關的一種表現，便是將辦報視為成

免令閱者以不睹全書為憾。茲特限定六期以前將《中國現在大概情勢》、《少年世界新文典》、《唐虞三代白話史》三書出完，以後始印別書。」但冊4全書似僅〈《孟子蓄疑》序〉一篇，及《中國現在大概情勢》一種。

93 李玲、陳春華，〈維新報刊的「面目體裁」——以《時務報》為中心〉，頁128-138；李玲，〈從刊報未分到刊報兩分〉，頁144-153。

94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頁188、198-200。

95 李玲、陳春華提到當時刊物用紙、裝幀考究，今日仍是許多期刊的特點；刊中多論議、少新聞，今日許多期刊雜誌同樣以論議為主要內容。見李玲、陳春華，〈維新報刊的「面目體裁」〉，頁128-138。另外，當時報刊論議受八股或某一具體的文派影響，亦屬正常現象(今日報文也會受當下文風影響)，似不能成為判斷當時報刊與書混同的依據。

96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頁207-208。

書的過渡，從而突顯包括經世書籍編撰在內，關乎著書的某些傳統，也成了題中應有之義。⁹⁷

當然，在另一方面，業已形成的某些偏好，並將之合法化為某種應然之報章體例的讀者，對某些太過直白的突顯傳統的方式已不甚買帳。如前所述，他們也曾向報館提議，並發揮施壓的效果。到第7冊，《經世報》開始採納讀者來信所期望模仿《時務報》的「縮字法」；至末3冊，終於逐步規避了無視文意的按行割截情況(附錄除外)。經過此時期的讀編互動，雖之後中文報刊事後「彙編」的工作仍不時可見，然而報刊的獨特價值已漸獲認同，將書的形態視為辦刊「目的」的觀念，似也日趨淡化。

五、論議定位與「經世」傳統

與前述體例問題相應，其時的一些士人與事者，也僅以報刊作為發言平臺，其相較一般的專論或文集，僅是使論議更及時地發表，並為人所知而已。如宋恕在早先擬就的〈《自強報》序〉中，一方面承認：「報館之設，於古無徵，然輶軒采詩，樂覽諷刺，其萌芽矣，……皇朝統宇，重譯來賓，赤縣之民，乃稍稍知有報館矣。海道大通，閱年五十，交易諸區，報館漸立。」即報館本質上是新事物。另方面他又說：

主館莫非他族，執筆蓋鮮通學，體例陋俗，訪錄蕪穢，談中說外，寡切多浮。或且索賂趨炎，變亂黑白，號以啟智，乃反增

⁹⁷ 承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鍾孫婷提示，此或亦有傳統可依，舊時且有一人多次編纂文集、最後合編為定本的做法。前者為過渡，後者為最終目的，當時不少士人報刊似也發揮此階段性的纂集功能。而清代書院亦有階段性纂集課藝的作法，參見魯小俊，〈課藝總集——清代書院的「學報」和「集刊」〉，頁34-39。

愚。夫豈報館負人？將人負報館也！雖然，使我邊海秀民，粗知域外之皮毛，略曉區中之情偽，則亦與有功焉。⁹⁸

西報文字多有流弊，士人介入辦報，即為佔領(而非適應)報刊這一具影響力的平臺，以矯正弊端。在〈《經世報》敘例〉中，這段意思被改成了如下文字：

粵自太師采風，陳達民隱，擇人道政，巡語邦國，報館之名，雖無職志，厥制萌芽。業已古古，戎秦任鞅，禁民議令，五三良法，蕩焉罔存。皇朝統宇，用人行政，必見邸報，部院所隸，亦有轅鈔。……[西人在華開報館]大率彼士樹其赤幟，計噓教焰，駟僮持作黑符，用罔市利，援儒入墨，借助十誠之波瀾，詬夷譽跖，詎當九品之人表，體例糅雜，有識唾棄。然而瀛環略誌，朝野僉載，使我邊海獷民，粗知域外之皮毛，窮壤硯士，略曉區中之情偽，則亦有毛髮之益焉。……[總之，應]善甄彼長，亟備己短，賴以鑿沌益智，保教護種，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爾。⁹⁹

⁹⁸ 宋恕，〈《自強報》序〉，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257-258。

⁹⁹ 〈《經世報》敘例〉，《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3。按《章太炎年譜長編》云：「〈《經世報》例言〉，文字古雅，亦似出於章氏之手。」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頁45。但如本文所述，該〈敘例〉實與宋恕〈《自強報》序〉意思相近。且〈敘例〉中有「戎秦任鞅，禁民議令，五三良法，蕩焉罔存」之語，而此期章炳麟應是推許商鞅的，如章氏在《實學報》即登有〈儒法〉一篇，稱許商鞅。反觀宋則一向貶低商鞅與法家。另外，宋恕將《時務報》、《知新報》、《湘學報》與《利濟學堂報》四報並舉，〈敘例〉中亦然，將溫州《利濟學堂報》與前三報並列，較像溫州人宋恕而非杭州府人章炳麟所為。見章炳麟，〈儒法〉，《實學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897年9月17日)，頁5；宋恕，〈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271-272。故〈《經世報》

在首冊「本館論說」欄的〈論報館足翊政教〉一文中，陳虬更是明示了士人辦報勢必勝於西報的信念：「然則，以西報之不文而可以行遠，苟吾報之與為馳驟，宜無善教善政之不周，環球萬國以升平！」¹⁰⁰

在闡揚主體性之餘，「若廼魚兔未得，筌蹄先忘，狂泉一飲，本性迷惑，但見末利，不顧本害，且加厲焉，於是伊川之祭被髮，楚宮之好細腰，棄夏可懼，陽秋其誰。」¹⁰¹若趨新流於以夷變夏，士林中的有識者便當適時製造輿論，以遏其橫流。另如陳虬獨作的報敘中所言：「夫立國之道，曰政、曰教，然其原皆出於學。」孔子之學壞於漢宋儒者，「蓋孔教之亡，已二千餘年矣。……昌明中學，在此時乎？今之言變法者，動欲步武泰西，一若中法舉無可采」，實際上列強的「植民之政」，未能出乎《尚書》及三禮之外，機器製造「溯其源流，亦皆僅得吾周秦諸子之緒餘」。「是則亞洲之不振也，豈真中學之不逮泰西耶？抑亦吾學不修，久而失其傳耳」。總之，「今中國不求自修其古大學格致之學，反役役於形下之西氏，如取火於燧，昧火之原，輒謂火熱於日，其去扣盤捫籥之見亦廛矣」。今作報文，為的正是「存四千年神聖舊學」。¹⁰²

而宋恕獨作的敘，重點亦在闡發中國既有之「經世」學術。他稱：「始汙經世者，別經世為學之一宗者也。」訓詁為孔門四科之始，辭章為終，而四科「何一非經世之學」。惜「四科之教」中絕，所幸尚有

敘例〉可能主要採納了宋的意見，或在其稿件基礎上再由他自己或旁人修改。

¹⁰⁰ 陳虬，〈論報館足翊政教〉，《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29-30。

¹⁰¹ 〈《經世報》敘例〉，《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3。

¹⁰² 陳虬，〈《經世報》敘〉，《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5-6。

以永嘉、永康、姚江之學為代表的「浙學」，可供後人發揚光大。¹⁰³即在他看來《經世報》之意旨，固同在求「變」，但「古」與「西」兩「變」之間，還是更應強調前者。¹⁰⁴

這裡應存在策略性的考慮。如早先陳虬《治平通議》、¹⁰⁵宋恕《六字課齋卑議》等著作中，對西學已多有認知與引介，此處反更突顯「向古」一面，或是其有所針對（針對「康學」或「西報」）所致。辦報的緣由在他們看來，並非外報本身值得稱道，而是可以將報文置入本土的學術脈絡，使之「淵源有自」。章、宋、陳三人所登論議，遏新潮之橫流的企望亦有明確體現。如章炳麟在首冊刊文〈變法箴言〉，即明指當前求新之士的「華妙」、「猝暴」二弊。宋恕在第8冊（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中〔1897年10月〕）刊文〈醫諷〉中，亦以己病初癒比擬甲午戰後所求醫國之方，強調不可病急亂投醫。另外，宋在第2冊〈《關中原人荒議》自敘〉中，將中原地區缺乏人才之況歸咎於蒙元、朱明兩朝，而當前應以所謂「江表之學」拯救之；第8冊〈書宗室伯福君〈知恥學會敘〉後〉，主論滿漢同異，均與西學無甚關聯。¹⁰⁶

¹⁰³ 宋恕，〈《經世報》敘〉，《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6-7。

¹⁰⁴ 不僅如此，在〈《經世報》敘例〉中提及館址之所以設於杭州，乃是因「杭州固錢趙舊都，今巡撫所駐，秘書藏閣，精舍詁經，人文之盛，齊州罕儔」。且後來館中欲印之書，為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王夫之《船山遺書》、戴望《顏氏學記》等，也都是可用以闡揚中國既有之「經世實學」的先賢著作，見宋恕，〈又覆胡、童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二十七日（1897年7月22日、26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6-577。

¹⁰⁵ 陳虬《治平通議》是其《治平三議》、《經世博議》、《救時要議》、《東遊條議》、《蟄廬文略》幾種著作於1893年的合編本，見陳虬，〈《治平通議》序〉，收入胡珠生編，《陳虬集》，頁213-215。

¹⁰⁶ 章炳麟，〈變法箴言〉，《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24-28；宋恕，〈《關中原人荒議》自敘〉，《經世報》，第

換角度而論，章、宋、陳三人刊文亦非從未涉及外來資源，尤其是陳虬，其引據聲光化電及西國政教知識資源，進而折衷中西的意旨，可能是三人中最突出的。至於其他人，除宗能述、徐維則等個別作者外，如館外撰述瞿昂來、董祖壽及吳應時等人的文字，即多以中外交涉或西政西學為主題；馬用錫、噫時子、周素與何炯等人亦將不少西學資源與中國既有知識資源並列。箇中關鍵，應在於「古」與「西」兩個向度，本無根本矛盾，均可被收羅在士林既有的經世訴求之內，如陳虬所言：「所尚無古今國外之殊，所志無儒佛耶希之判，所急無王公卿士之差，所長無文武邑野之異，所習無天地人物之分，所利無家國君民之別，則所謂經世之學是也。」¹⁰⁷惟仍應維繫中西資源的主客分野，如陳虬的〈論尊孔教以一學術〉，明言外國各教「得五倫之正」，無一可及孔教。章炳麟〈讀《管子》書後〉，以《管子·侈靡》篇為「泰西商務所自出」。¹⁰⁸宋恕〈西蜀拯饑芻言〉亦言及《管子》的「平國策(策)」之學，¹⁰⁹所論與章氏有異，然亦強調應闡揚中國既有的伊尹、太公及管仲的理財養民之術，而非西國政法。¹¹⁰亦即，外來知識只是被收入而非取代中國經世之學，就此而論，前述各篇報敘的

2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中(1897 年 8 月)，頁 27；宋恕，〈醫諷〉、〈書宗室伯福君〈知恥學會敘〉後〉，《經世報》，第 8 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中(1897 年 10 月)，頁 23、頁 24。

107 陳虬，〈經世宜開講堂說〉，《經世報》，第 4 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上(1897 年 9 月)，頁 25-26。

108 陳虬，〈論尊孔教以一學術〉，《經世報》，第 2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中(1897 年 8 月)，頁 30-31；章炳麟，〈讀《管子》書後〉，《經世報》，第 3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 年 8 月)，頁 25-26。

109 《經世報》第 11 冊筆者未見，該文錄自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280-282。

110 另宋恕批評時人以墨子比附西學，轉而突顯二者的區別。見宋恕，〈墨白辨〉，《經世報》，第 9 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下(1897 年 10 月)，頁 21。

表態定位，尤有意提示閱者在包羅萬有之餘不可忘本。

然而問題在於，這種力求維持「古」與「西」既有主客之分的經世立場，在報刊促成知識觀念交流更為頻繁的背景下，須受各方讀者更為嚴苛的考驗。同在二十三年七月，上海《實學報》創刊，發起者為王仁俊(1866-1913，江蘇吳縣人)等，其與《經世報》所呈現的某些論調頗為相近。除卻二報曾共用銷售網路外，當時張元濟(1867-1959，浙江海鹽人)在致梁啟超的信中，亦曾將二者相提並論：

近見《實學報》、《經世報》，皆有顯與《時務報》為敵之意。此皆例有之阻力，執事幸勿為所動也。《經世報》言多粗魯，姑勿論。而《實學報》則最足以動守舊者之聽，且足以奪貌新者之心，濟料其聲勢必將日大。……非謂異我者，即在所必擯，泰西報館豈無異趨。所恨者以燭火之微，而亦欲與日月爭明。使為守舊之徒，猶可言也，而偽在世似新之輩。¹¹¹

可見，張元濟這樣的讀者也看出了這兩份明標「經世」、「實學」的刊物有意與《時務報》「為敵」；其所據者可能是兩報「本館論說」之類的論議專欄，只是相比《實學報》，《經世報》「言多粗魯」，連作為「似新」一方代表與汪、梁一爭的資格也沒有。¹¹²當然，由此同樣可見的是，《經世報》在內容上反響不佳，亦非僅是因其主張不夠徹底、進步，更可厭的或是在貌新實舊之餘，尚有下列關於文字本身的問題。

因材料所限，仍就章、宋、陳三位主筆論議，探討《經世報》受認可的程度。首先是章炳麟。章在《時務報》期間，即有人不滿其文風，

¹¹¹ 〈張元濟致汪康年書〉，第24通(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廿二日，1897年10月17日後)，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713。

¹¹² 《實學報》持續時間也不長，很可能還短於《經世報》，目前所見最後一冊為第14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98年1月3日)。

只是多指其文過「雅」，太似「文集」之文，而非過於「粗魯」。¹¹³然而章氏僅在《經世報》前4冊登有文章，後與經營者發生齟齬，也應是與其在該報上發表敏感的政治言論有關（詳見下節）。¹¹⁴另如蔡元培曾評論首冊中館中撰述的文章：「惟章炳麟枚叔所作，有理有故；若陳虬志三、宋恕燕生，駁矣。」¹¹⁵猶見蔡對章氏〈變法箴言〉一文的觀感還要優於另兩人。同時，章還是上海《實學報》、《譯書公會報》的撰稿人，推測令讀者認為《經世報》比《實學報》不堪的，應非章的文字。

至於宋恕，出報前似乎即有人將其報文與康梁比較，¹¹⁶宋的反應甚為強烈，在二十三年七月初七日（1897年8月4日）致胡、童的信中痛斥：

拙文自知高古不如枚叔，然勝康長素師徒則遠甚！恐京外四品

¹¹³ 如黃遵憲即曾對章炳麟〈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一文委婉評論道：「章君學會論甚雄麗，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報館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讀之而悉通，則善之善者矣。」見〈黃遵憲致汪康年書〉，第27通，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1897年4月11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3冊，頁2351。

¹¹⁴ 天津《國聞彙編》旬刊之停辦，主事者之一的王修植在致函汪康年時稱：「《國聞彙編》閱者多以文義艱深為嫌，每期僅售至五六百分，實在賠本不起，現已停止不印，專辦《日報》（指《國聞報》）。」可見與報文過雅直接相關。見〈王修植致汪康年書〉，第7通，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七日（1898年2月27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冊，頁81。而曾在《國聞彙編》刊首連載〈天演論懸疏〉與〈斯賓塞爾勸學篇〉等的嚴復，似亦應對停刊負有責任。

¹¹⁵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卷15，〈日記1894-1911〉，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廿九日（1897年8月26日），頁137。

¹¹⁶ 其中可能包括早先胡道南、童學琦二人的來信，稱收到宋恕「大作兩篇，憂患之作，不為空言，是能於澳、滬諸報外別樹一幟」，見胡道南、童學琦，〈致宋燕生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1897年7月25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8。

以上未必有解人(專指現任實缺者言。四品以上惟翁叔平、徐壽蘅、陳右銘、許仙屏為稍知文，李合肥為稍知政，然皆未得為有學)。蓋不學無文，未有甚於今之四品之上者也。奚怪張香濤以村學究鈔書目而得大名乎！¹¹⁷

胡、童三天後回信稱：「昨奉手教，並大著一篇，氣寒骨峻，乃能於報章文體自樹一幟，解人難索，誠如尊示，抑豈專四品以上乎！」¹¹⁸吹捧之餘，已露不滿與為難之意。同年十月初八日(1897年11月2日)胡、童致信宋恕，謂宋與陳虬的報敘，「都友來書」稱「閱者亦有微詞」。¹¹⁹十月十六日(11月10日)信中，二人還以「同人謂體近騷賦」為由，拒絕了宋的一篇文章，同時欲請宋在年內再寄3篇稿件，以充第14-16冊之篇幅，¹²⁰但宋僅在第14冊登有文章，之後不復見其供稿。推測對於此類批評，宋亦不願自降身段，儘管他可能已有策略性的立異意識，卻仍視學力與文風上的曲高和寡為理所當然。

相形之下，在溫州主辦《利濟學堂報》的陳虬，對在報中直抒胸臆、不肯降尊紆貴一節並未堅執。他是三位《經世報》本館撰述中，刊文最多者。¹²¹但據現存材料，陳的論議卻最有可能是「言多粗魯」一語的攻擊目標，關鍵不在於今日看來的守舊，而在其聯結「古」與「西」的表達。

¹¹⁷ 宋恕，〈又覆胡、童書〉，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81。

¹¹⁸ 〈宋恕親友函劄·童學琦等〉，第6通，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十日(1897年8月7日)，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316。

¹¹⁹ 〈童亦韓、胡鍾生來書〉，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1897年11月2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86-587。

¹²⁰ 〈宋恕親友函劄·童學琦等〉，第9通，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1897年11月10日)，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317。

¹²¹ 陳13篇，宋8篇，章5篇，包括首冊報敘、〈興浙會序〉等非「本館論說」專欄之文在內。

事實上，陳氏主持的《利濟學堂報》讀者如譚嗣同(1865-1898)即予以激烈的批評，稱其「為害不淺」，箇中要點，則在所謂「陰陽五行、風水王遁、星命諸說」。¹²²而陰陽五行、風水堪輿與某些傳統知識類別，尤其是與醫學的結合，至此期仍是常見現象，曾興辦瑞安及溫州利濟醫院(中醫)的陳虬亦不例外。在《經世報》，陳也不免將其在早年著作與《學堂報》的某些論說習慣帶入論議，如其報敘中論證西國政學根本上不及中國時，便露骨地援用了象數星命之說：

間嘗聞其義於〈洛書〉之說矣，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亞洲地居東半球，為坤輿正面，獨稟靈淑之氣。……(近為宇說者，謂南方蠻閩從蟲，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皆異種，惟西方棘人僬僬及東夷字皆從人，或居坤地得順理之意，或稟木氣成仁壽之俗，確得倉頡真傳，……仁冠五常，乾統四德，東球木火，管局仁壽，禮讓根於性俗，混一全球，終出黃種。泰西近日雖漸講公普，然天驕鷲性，須歷過土運，方可漸語大同。)西界鬼宿，隸齒辜奴，邪魅吸人精髓，雖憑陵廟社，不能與正神賽血食之靈長；奴隸盜吾名器，雖濫廁衣冠，不能與薦紳爭世澤之綿遠。¹²³

另在〈遷都——救時十二策之一〉一文中，陳虬大談歷代國號與王朝氣運的關聯；¹²⁴〈分鎮——救時十二策之二〉中，他復稱意欲「自強」，不可光靠「人事」，而應慮及「天文、地理」，然而尤關注「水運」，表明此處所謂天文地理，仍與星相堪輿之類密切相關。¹²⁵亦儒

¹²² 此係譚氏致汪康年信，見〈譚嗣同致汪康年書〉，第20通，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廿四日(1897年7月23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4冊，頁3258。

¹²³ 陳虬，〈《經世報》敘〉，《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5-6。

¹²⁴ 陳虬，〈遷都——救時十二策之一〉，《經世報》，第5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中(1897年9月)，頁22-23。

¹²⁵ 陳虬，〈分鎮——救時十二策之二〉，《經世報》，第6冊，頁23-24；第

亦醫的陳虬，在此也未嘗不是將一些邊緣性的古學納入經世語境，進而與新近之西學融通；只是儒學正統對怪力亂神向來的摒斥，同樣與外來的科學主義有所結合，使得此類融通反因報刊的宣傳變得更為刺眼，成為某些讀者必擯的新異端。譚嗣同曾撰〈報章文體說〉，稱報章可以「甄九流、綜百家」，包羅萬象，¹²⁶但當作為讀者，他仍不免挑挑揀揀。此外，陳的同鄉、瑞安縣學者孫詒讓，曾致信汪康年控訴陳虬「所論絕淺陋」，似也有指斥陳虬上述表述習慣的成分在內。¹²⁷

至於其他作者所刊論議，筆者迄未見有讀者的具體評論紀錄。惟就體例與主筆論說所定的報刊基調而言，《經世報》較之康門師徒論議或外國人士所創之報，似更強調本土經世傳統對於外來資源的包容性，及中國知識資源在其間的主體地位。只是，更頻密的讀編互動，¹²⁸往往意味著對知識觀念及其載體風格的遴選篩汰更顯嚴苛，角度也更多元。某些在以書為主的時代尚可另起爐灶，進而藉以正本清源的做法，此時反受讀者對於新媒介之成見的影響，變得更加難以如願。可以說，傳統上讀書人透過著書、編書以闡揚經世之學，與清末編撰咸與維新的報文，經此讀編互動的過程才顯現出若干根本性的差異。而中國報刊在體例內容上的「近代」特質，亦非如現今學者描繪的那般援用西人(或東人)成法進而穩健塑成，而是在此亦新亦舊的標準之間選擇並實踐，才被逐步建構起來的。

8 冊，頁 20-22；第 9 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下(1897 年 10 月)，頁 19-20。

¹²⁶ 譚嗣同，〈報章文體說〉，《時務報》，第 30 冊，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廿一日(1897 年 6 月 20 日)，頁 20。

¹²⁷ 〈孫詒讓致汪康年書〉，第 5 通，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99 年 1 月 6 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 2 冊，頁 1476。

¹²⁸ 有時則是同樣可作為「讀者」的「編者」與「撰者」的互動，如前述胡、童對宋恕之文的意見。

六、報刊與「學會」

前文在發行運營方面，探討空間與地域問題；體例內容方面，則討論了報刊與當時士人既有之經世意識的具體關聯。而地域性與經世之學在報中尚有交集，主要反映在與事者以報刊為發聲渠道，以及創建「浙學會」的企劃之中。

其時，各地多有學會之設，如梁啟超即曾歸結說：「桂林有聖學會，長沙有湘學會，武昌有質學會，蘇州有蘇學會，上海有算學會、務農會、不纏足會等次第興起。或規模已成，或草創未定。」¹²⁹而《經世報》創辦伊始，主事者便有意設立配套的學會。惟因浙學本自成系譜，故所設之學會，也被視為與以往士人結社無異，可賴以發揚某地域的傳統。1897年7月宋恕在致章炳麟的信中即稱：

執事欲振浙學，與恕蓋有同情。然非開學會不可，非請曲園師領袖其事不可。鄙意欲俟此館既開，擬一〈浙學會章程〉，邀集同門雅士，公請曲園師出名領袖。倘蒙師允，即將章程登報，立總會於此館，漸立支會於各府縣城，期於大昌梨洲之學、德清之道，方能為浙人吐氣。¹³⁰

亦即，在宋看來，浙學會固要依託浙省報館，但必請在傳統學術方面深有造詣的俞樾擔任領袖。而該會所弘揚的，也應是黃宗羲(1610-1695)、戴望(1837-1873)等浙籍先賢的「學」與「道」。宋的報敘更是明言：

[經世報]以表四科一學，以表儒嫡在浙，以表斯館乃基學會，斯

¹²⁹ 梁啟超，〈會報敘〉，《時務報》，第38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頁28。

¹³⁰ 宋恕，〈覆章枚叔書〉，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897年7月14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3。

報非逐市利，以告我浙人及非浙人，以告我赤縣人及非赤縣人，
繼自今，其勿復敢輕浙人！其勿復敢輕赤縣人！其極無浙無非
浙，無赤縣無非赤縣，所謂太平之世，遠近若一，則斯報之終
事也夫。¹³¹

由一省推至一國再至世界，然關鍵依舊在於中學或儒學自身的脈絡中，為浙學攘奪嫡系的地位。

當時上海《實學報》也登有蘇州蘇學會告白。儘管該會相對不強調地域性，自稱「非專從蘇省一隅起見，如有賜教，無分畛域」，¹³²但章程中亦逕引籌辦京師大學堂的孫家鼐(1827-1909)之言稱：「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會宗旨。」¹³³或許可以說，相較《湘學報》／南學會、《蜀學報》／蜀學會以及《廣仁報》／聖學會等自我期許開一區之風氣的報刊／學會，《經世報》／浙學會及《實學報》／蘇學會不同之處在於，一方面其位處蘇浙兩省，為上海《時務報》發行網絡的核心地區；另一方面對於正本清源的期望，反較求新更為迫切。此時蘇南浙北構成的文化中心區域，依託報刊呈現的思想面貌，也顯得細緻且複雜：其對內在的西學傳播中心上海，既有扶持育成的一面，也有帶著地域性的學術傳統以糾偏救弊的一面。

在六月中下旬登於《申報》、《新聞報》的《經世報》告白中，提到「將開經世學會」；《經世報》首冊告白中，則稱「本城近創興

¹³¹ 宋恕，〈《經世報》敘〉，《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7。

¹³² 〈本館告白〉，《實學報》，第2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頁1。

¹³³ 孫家鼐，〈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摺〉，1896年8月，收入湯志鈞、陳祖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戊戌時期教育》，頁122；〈試辦蘇學會簡明章程〉，《實學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廿一日(1897年9月17日)，頁1。

浙學會」，明揭地域色彩，並於浙學會前添一「興」字。¹³⁴第2冊的學政一門，刊登章炳麟撰〈興浙會序〉，則又少一「學」字。結果就是在這有意無意的調整中出了問題。章氏在該〈序〉中，開篇即大講浙人的尚武精神，力證「浙人非儒，浙土非不可用」，並稱：

往者中東之役，群儒上書以釣名譽，而頑頓者，以浙人不與為大詬。烏虜！虛僑主戰，以抵誣疆臣，而謀臣則未嘗責其妄言不讎，且承其風旨，以諂事之，是實同時上書者之恥，而浙人乃適足以自豪也。¹³⁵

即不以未參與公車上書為恥，反以為榮。接著他提及劉基(1311-1375)、于謙(1398-1457)、王守仁(1472-1529)、黃宗羲、張煌言(1620-1664)等明代浙籍人士的政治表現，重點則在他們對夷夏之辨的堅執，尤其黃、張二人的抗清活動與言論獲高度評價。之後他總結道：「金華屠，嘉興殘，……使浙人之不忘隱痛者，實賴是人。」¹³⁶該文雖主論傳統，鮮有西學痕跡，但與題中少一「學」字相應，將重點放在闡揚浙江讀書人的從政與議政傳統，而非學術傳統，措辭亦少忌諱，很快便在士林讀者中引起軒然大波。

緊隨該〈序〉，又刊〈興浙會章程〉，該文是否同為章氏所擬，難以確考。該章程要點回歸於「學」，而其前半部敘述中土學派之分、經史中西之異同，卻像是讀書心得。至於學會本身，則將之設想成一個極鬆散的組織架構：「全浙幅員，雖非寥廓，溫、處等州，則亦距省千里。若豫刻會期，徒滋繁擾，擬以暇時聚集，赴省者會於省，赴

134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32。

135 章炳麟，〈興浙會序〉，《經世報》，第2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中(1897年8月)，頁6-7。

136 章炳麟，〈興浙會序〉，《經世報》，第2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中(1897年8月)，頁7。

郡者會於郡，聲氣既通，亦免跋涉。」此外，無須建立公共書藏，只須自行「通借」即可。會中「擬設會長二人，會董二人」，會長「必取博綜古今、通達經濟者」，似為榮銜；會董「常駐省城，凡撰述佳者，既經同人平議，復取決會長，乃由會董刊為報章，每月一冊（其資即以捐項充之），分政法、藝事、商務、輿地四類」，其責任只是查收稿件、編書出版，與一般報刊書坊的編輯人員幾無差異。¹³⁷

從第 5 冊起，《經世報》中不再出現章炳麟的文章，可能與該篇直抒胸臆的〈會序〉及章程引致的風波有關。報館或許為了補救，第 6 冊登告白稱：「友人來書，謂本報第二期所登〈興浙會序〉及章程，『興浙』下宜有『學』字，以遠嫌疑，敬當遵致會中同人，於刊佈章程時添入。」¹³⁸同時，學政一門刊出許家惺撰〈續擬興浙學會章程〉，算是對學會辦法做了更明確的交待。¹³⁹第 8 冊又登告白，向讀者重申：「本館第二、第三期所登〈興浙學會序〉及章程，疊接友人來書謂措辭殊欠妥洽，遵即轉致會中同人，屬令改訂。」¹⁴⁰但影響業已造成，第 3 冊有董祖壽、連文濤(?-1922, 浙江錢塘人)與章炳麟三人列名興浙學會，第 5 冊復有許家惺列入，可至此以後，學會題名便沒了下文。¹⁴¹至二十三年十月八日(1897 年 11 月 2 日)，胡道南、童學琦在致宋恕的信中仍抱怨：「迭接友人書，均以枚公〈興浙學會序〉欠含蓄，因之入

¹³⁷ 〈興浙會章程〉，《經世報》，第 2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中(1897 年 8 月)，頁 7-8；第 3 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 年 8 月)，頁 6。

¹³⁸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6 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下(1897 年 9 月)，頁 1。

¹³⁹ 許家惺，〈續擬興浙學會章程〉，《經世報》，第 5 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中(1897 年 9 月)，頁 10；第 6 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下(1897 年 9 月)，頁 7。

¹⁴⁰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8 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中(1897 年 10 月)，頁 1。

¹⁴¹ 另第 5 冊《經世報》「格致」一欄登有董祖壽〈化學公會緣起〉，從第 7 冊起復有「化學公會」題名，不限浙籍人士參與，題名數也明顯較興浙學會為多。

會者少。」¹⁴²

另外，也是從第 5 冊起，報中有設「興浙文編」之議。有讀者來信建議：「本報冊末宜附登『興浙文編』，專言浙事。」同期報中即登告白：「本館擬采輯『興浙文編』，凡興利除弊與夫表章潛隱，有所論著，乞隨時郵寄本館次第刊佈，聊當古時風詩之獻。」¹⁴³第 7 冊便有「興浙文編」一門，主要刊登關於本省興革的士人文稿。第 8 冊告白中稱，因「投稿尚稀」，該專欄暫不編次；而為刺激來稿，原由作者自付的郵資，此後也改由報館支付。¹⁴⁴

第 8 冊中還有讀者來信建議：

遍搜貞隱，博采膚論，似於「興浙」之名未為恰當，必擇實事可行者，或已見諸施行者，或利可興、弊應除者，或古當復、今宜改者，不論案牘文移、私家著論，分門別類(如吏戶禮工刑兵之屬)，按期刊載，而傳志之文，必其行事可師法者，始行刪錄，蓋重在事，不在人與文也。¹⁴⁵

猶見讀者對此新專欄也有不滿，而所據者仍包括《皇朝經世文編》的體例。之後該門成為常設專欄，第 7-16 冊登有 6 篇文章(連載算一篇)，僅第 14 冊空缺。但在興浙文編專欄作者中，似僅許家惺一人曾列名興浙學會，「文編」與「學會」雖均以「興浙」為名，事實上卻可能無甚關聯。至第 15 冊，乾脆登告白以撇清關係：「本報登有興浙學會、化學會兩事，均係館外人創議，托本館代登章程告白，如何辦法，

142 〈童亦韓、胡鍾生來書〉，第 2 通，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八日(1897 年 11 月 2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86-587。

143 〈答友人議本報體例書〉、〈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5 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中(1897 年 9 月)，頁 1。

144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 8 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中(1897 年 10 月)，頁 1。

145 〈友人來書〉，《經世報》，第 8 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中(1897 年 10 月)，頁 1。

本館實未暇與聞。」¹⁴⁶似表明此番依託報館的「興浙學會」之議，最終在幾乎無人理睬或人盡避之惟恐不及的氛圍中流產。

而至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初，因《時務報》館汪康年與梁啟超的矛盾公開化，¹⁴⁷浙、粵矛盾再次激化，有浙籍士人復起浙學會之議。據陳敬第(陳叔通，1876-1966，浙江仁和人)、漢第(1874-1949)兄弟所言，該會旨在「杜康教之侵吾浙士」，與此前興浙學會之旨趣頗為近似。¹⁴⁸原對梁啟超等頗多稱許的葉瀚(1861-1936，浙江仁和人)，亦轉而擬訂詳章，「以浙學會為總目，而以時、格、農、蒙四會為體」，且稱：「南海偽學，其勢雖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將來，必一敗塗地。但目今其聲氣可席捲天下，被累不少，故弟與同志約，不容彼黨侵入浙界。」只是葉瀚還擬「以上海為總會」，已明確越出浙省範圍。¹⁴⁹另，陳敬第還曾致信汪康年，請其主事，結果汪氏選擇在滬續辦《昌言報》，此事遂告罷議。¹⁵⁰

¹⁴⁶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5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下(1897年12月)，頁1。

¹⁴⁷ 參見廖梅，《汪康年》，頁180-206。

¹⁴⁸ 〈陳漢第致汪康年書〉，第6通，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8月2日前)，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2045。陳漢第另信復稱：「湘學已為康教所惑，浙學汲汲宜辦，以杜其萌芽，先發制人，此其時矣。」見〈陳漢第致汪康年書〉，第7通，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898年8月3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2045。

¹⁴⁹ 〈葉瀚致汪康年書〉，第54通，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1898年7月29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3冊，頁2600。

¹⁵⁰ 〈陳敬第致汪康年書〉，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收信，《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2020；〈陳漢第致汪康年書〉，第6-8通，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五、十六日、七月二日(1898年8月2、3、18日)，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2045-2046。維新時期的興浙會、保浙會諸團體之辨析，參見胡珠生，〈興浙會和保浙會是兩個團體〉，頁96-99。實際上，依託《經世報》之興浙會、陳虬等倡設之保浙會及上

七、結語

維新時期，中國士人開始全面介入辦報。今人通常近乎理所當然地以《時務報》為討論中心，相較本文論及《經世報》的辦報經歷，似乎虎頭蛇尾，沒有那麼成功。與事者之一的宋恕，在光緒二十六年(1899)致梁啟超的信中便稱：

丁酉秋，同鄉某君開一館於浙，其取名大而不通，其條目及所登之文、所譯之報可笑者居十之八九。僕不過月寄文三首，餘一概不與聞。甫寄數首而眾謗沸騰，與館主意見日離日遠，遂絕不寄，而該報館旋亦停閉。僕生平文字，惟是年登數首於報紙，前後皆無隻字，以自揣學派政論太與今支那人寡合，而又不肯曲說阿世，故不願送登。不願中雖含有大分不屑的長性質，亦含有幾分不敢的短性質。¹⁵¹

文中應有為改善宋、梁二人關係所作的誇張遮掩，如與章炳麟商議報文取向、組織學會、幫助在上海刊登廣告等，宋並未完全做到「餘一概不與聞」，但這段經歷未給宋留下好的回憶，應屬實情。宋也坦承自己的報文不受歡迎，只是關鍵仍在不願「曲說阿世」。相比之下，向《經世報》供稿較多的陳虬，更富推銷自我的熱情，只是實際引致的評價，似更趨於負面。

此期的辦報經歷，對宋、陳二人影響頗大。宋此後未再擔任報館

述汪梁矛盾公開化後的浙學會，因不同緣由均未付諸實踐。

¹⁵¹ 該信尚有小字注，稱自己給張之洞與李鴻章的兩封上書曾登於光緒十六、十八年(1890、1892)《漢報》與《萬國公報》，均是報館「自采登之，非僕送登，頗有數語點金成鐵，縣名亦誤」。宋恕，〈致飲冰子書〉，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1899年9月23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603。

主筆，在士林中的影響力似也就此走下坡。¹⁵²陳虬則同時因《利濟學堂報》收益不佳，並受同鄉望族士紳打壓而瀕於破產，自此蜷伏鄉里，於光緒二十九年冬(1904年初)悄然謝世。¹⁵³惟涉入較淺的章炳麟，與汪康年在《昌言報》館尚有合作，後為《臺灣日日新報》、《清議報》、《亞東時報》等報供稿，再後因《蘇報》案聲名大噪，自此多次受報館之聘，只是對這段在《經世報》的經歷，章之後也未再提及。¹⁵⁴其他少數參與者之後還曾參與報務，如許家惺據稱曾任《時務報》館書記，後又擔任《中外日報》(維新時期原名《時務日報》)主筆；¹⁵⁵經營者之一的童學琦，據稱庚子後新政初年，亦曾任《杭州白話報》主筆。¹⁵⁶

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即陳虬曾被後人列為近代維新思想的前驅之

¹⁵² 楊際開曾分析認為宋恕的政治思想是近代變法改革的源頭，甚至是革命思想的一個起源，卻無視宋對革命一貫的反對態度，見楊際開，《清末變法與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為中心》。該書實際是將溯源式的整理以及對人物關係的考察，直接等同於該歷史人物的影響力，其論證所得結論，自然大可商榷。

¹⁵³ 參見池志激，〈陳螭廬先生五十壽序〉，收入胡珠生編，《陳虬集》，頁392；〈瑞安利濟醫院股分票〉，收入胡珠生編，《陳虬集》，頁430。

¹⁵⁴ 當然，章炳麟之後的一些報文，誠有張大其詞以求煽動讀者反滿情緒的策略性考量，但如在《民報》時期作佛聲之類的表現，亦可理解為其對直抒胸臆的堅執，對於報館之文與傳統文集之文，在實踐中仍不願強作區別。擴大而論，讀者對章氏各類文字的接受情形如何，其學術主張與政治見解在傳播層面又有何關係，亦甚複雜，需要專文探討。相關最著名的意見(或有調侃的成分)，即魯迅對孫詒讓與章太炎之影響力的比較，其基準不在二人學術水準的高低，而在章氏後來「提倡種族革命，趨時，而且還造反」，致其聲名遠揚。參見魯迅，〈趨時和復古〉，收入魯迅，《花邊文學》，頁565。

¹⁵⁵ 見〈各家小傳·許家惺〉，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4冊，頁4136。

¹⁵⁶ 見〈各家小傳·童學琦〉，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第4冊，頁4167。但據筆者翻查，《杭州白話報》(1901-1904)中文章多未署真名，不知其中何者是童學琦的代稱，參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卷2上，頁179-195。

一，¹⁵⁷宋恕近年亦常被列入近代思想家的系譜，但他們在維新時期的報文，卻不甚受歡迎。這一點，似不能僅以思想史的某種內在理路，或思想觀念自然而然的新陳代謝過程作解。媒介之變與士人既有觀念的整合方式，亦是與本主題緊密相關的一個面向。

事實上，就知識思想的一般物質載體——「書」而言，陳虬《治平通議》之類的著作，固然刊布在乙未至戊戌(1895-1898)年的維新變法時期之前(1893年，較早的內容作於1880年代中期)，可是此書傳播至更大的地域範圍，也多少受益於甲午戰後世變的大環境。如陳自己說，戰前他「首倡變法之議，挾書走京師，為時詬病，不幸多言而中，頗蒙當途薏采」。¹⁵⁸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借進京會試之機，將該書印本贈予京津地區官場中人。¹⁵⁹據稱，張之洞見到該書，即「大悅，渴欲接談」，表明戰敗激發的「國恥」意識，亦有利於其著作的廣泛傳播。¹⁶⁰而宋恕的《六字課齋卑議》初稿，於光緒十八年撰成，當時即曾寄示師友，結果多數意見認為持論有欠謹慎，不應廣為流布。¹⁶¹維

¹⁵⁷ 參見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頁295；陳虬，《治平通議(選錄)》，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1冊，頁217-229。

¹⁵⁸ 陳虬，〈《經世報》敘〉，《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頁6。

¹⁵⁹ 〈宋恕親友函劄·王修植〉，第2通，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895年4月14日)，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158。

¹⁶⁰ 宋恕，〈致陳志三書〉，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1895年10月3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37-538。

¹⁶¹ 其中最謹小慎微的意見，如有人聽聞宋恕擬將此書進呈李鴻章，曾規勸說：「鄙意圖之，還請慎思！將謂藉此《卑議》邀幸於當道與？可以不必過用犯諱之言。將謂藉此《卑議》質諸當道，此後大名遠播與？可以不必希此虛名。……今欲外博虛名，胡為哉！」見〈宋恕親友函劄·唐天燮〉，第9，通光緒十八年三月十五日(1892年4月11日)，收入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294。

新時期，該書則與陳虬《報國錄·治平通議》一同被收入梁啟超之《西學書目表》。¹⁶²且光緒二十三年，《六字課齋卑議》修改後還有印本問世。惟印數僅 200 部，似表明宋本人對書之流通亦有疑慮，不願讓他認為不夠資格的讀者順利接觸到這部著作。¹⁶³

可見當時「士」氣的空前高漲，實為一些已出版的經世或求「改良」的書籍，提供更加廣為流傳的機會。可是，流傳能否產生持續性的影響，則還要經得起報刊的挑戰。具體言之，這涉及傳播機制的差異：十九世紀以降，論議經世之學或早期改良思想的書籍，最初多透過進呈或寄贈等方式傳布，其傳播模式是漸進的點對點傳播，以此保證讀者為較親近或較有地位、學識者。而到維新時期，儘管士人辦報借助官場等非市場的力量依舊普遍，但主要的明顯差異在於經營與撰作的分離，士人文字甫一面世，即要點對面接觸地位、學識無法預期的讀者。¹⁶⁴如此漸成常態後，有意參與其間的讀書人，無論其為思想史中的任何派別，均須在編撰水準之外，面對拉遠的撰讀距離，並展示其調適能力。與此同時，讀者多角度的選擇與回饋意見，讓編撰方頻繁地接收了讀者給予的考驗，進而更為直接地影響其相關思想言說的歷史走向。由是申論，此番的發散式考察，正為檢視報刊作為新型輿論空間的初期運作機制。此間個別報刊的高亢獨白，無法證明其代

¹⁶²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頁 1158。其中《報國錄·治平通議》下注「總名《蟄廬叢書》」；《六字課齋卑議》表中誤作「中議」，下注「未刻」。

¹⁶³ 宋恕，〈又上俞師書〉（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899 年 1 月 21 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97。同信中復稱：「世雖專講富強，而未知賤著（《六字課齋卑議》）宗旨，頗多索閱，客臘乃付活字肆排印二百分，以應堅索者。京外所謂新舊黨領袖多與受業水火，以此不得達九重，然亦以此免禍。」見宋恕，〈又上俞師書〉，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 597。

¹⁶⁴ 當然書的傳播也更多地利用了報刊平臺，其受眾亦更形「陌生」。

表性從何而自，故應從整個場域內部的動態關係建構與競爭博弈來重新審視此一問題。

此內置於士林的媒介場域，其形成有賴一個標竿的推出。這一標竿並非出現更早、帶有「洋商」或「洋教」背景的《申報》、《萬國公報》等報，而是中國士人操持的上海《時務報》。¹⁶⁵惟標竿不等於代表，其他士人起而響應之餘，亦會多少摻入各自對報刊運營與編撰的理解。外在的發行營運方面，不少報刊頗欲借重《時務報》及其他滬報相關的社會資本與經營經驗；另一方面，康門師徒的學說政論，對士林中人而言向來爭議較大，則又使《時務報》被一些人視為糾偏救弊的首要標靶。杭州的《經世報》，即是一份集這兩種看似矛盾取向於一身的刊物，其利用仿照《時務報》搭建的平臺，卻豎立帶有地域色彩的學術旗幟，以此建構傳統思想學術版圖上的浙、粵(或浙、康)之別。

理解上述矛盾的關鍵或許在於就不少時人看來，康、梁一系從未能夠代表整個維新陣營。¹⁶⁶質言之，時人多以為，「因時變通」既是外力所迫，更是儒學自身所包含或容許的一種意識。而向「古」與向「西」兩個向度，大可同被收納在士林既有的經世訴求之內。¹⁶⁷甲午

¹⁶⁵ 士人辦報不是維新時期才開始的，如同治十二年(1874)創辦的《循環日報》，也由士人(王韜)主持，但並未催生士人競起辦報的高潮。有已有學者探討《循環日報》對中國士人階層的實際影響，參見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頁113-114。

¹⁶⁶ 另對戊戌前後「康黨」指涉之流變，參見賈小葉，〈「新黨」抑或「逆黨」——論戊戌時期「康黨」指涉的流變〉頁23-48。該文認為章炳麟在《時務報》館與康門中人大打出手，呼後者為「康黨」，係「康黨」得名之始。

¹⁶⁷ 「古」、「西」與經世訴求的聯繫，或可被表述為與十九世紀以降「自改革」訴求之聯繫，參見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上冊，頁106-107。

戰後的爭言維新，大可被視作是延續前已顯露的經世思想。¹⁶⁸此時將新型輿論空間的建構、反映西學新知的譯稿以及取向各異的論議三者，以各種形式合作於一處，即為當時士林報刊的普遍表徵。而《經世報》與事者在論議中強調「古」甚於「西」，除了可藉以拉開與康學的距離，還可用以揭橥異於上海的地域特徵，並將士人辦報與西報或商報區隔開來；只是，維新時期逕將經世作為刊名，似僅《經世報》一例而已。

由是觀之，儘管此期西學東漸的問題已更顯突出，卻仍多自然而然地被轉為中土的經世傳統或士林的內部問題，不只康梁一系如此，不少士人更如是，且還不時與地域性的學術資源建立聯繫，幾近形成傳統意義上的學派紛爭。¹⁶⁹可是，此種「內部化」的博奕已能依託報刊媒介發生，故在實踐中難以遵循傳統思想學術史的內在理路，而不得不擴散到報刊體例、傳媒功用以及配套之組織(如學會)等各方面。士人報刊一時蔚起，同時卻又普遍依賴官場、捐助等非市場性要素，市場手段預想與實際的調節作用均屬有限，於是反有利於鞏固《時務報》較早從地緣、人脈乃至行政力量所建立的地位。同時扭轉時風或士風的表態，則易受媒介的地域布局與讀者成見等因素頻繁干擾，而反被

¹⁶⁸ 王爾敏視此階段為清季經世思潮的最高表現。參見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頁 42。

¹⁶⁹ 茅海建曾論及，戊戌變法正式啟動後司員士民(主要是在京者)的上書問題，中列「西學與中學」一小節，認為這些讀書人對中學地位不保的擔憂更甚，而研求西學的動力尚且不足。當然他也表示：「我對現存上書的分析，當屬今日之思想溯源，本著世界上現存的、我腦中認知的改革經驗，作一次逆向的思考，潛藏著『應該如此而非如此』之類的假設前提。」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頁 292-300、341。筆者無意否認今人的後見之明也是一種「明」，只是尚須將之與時人自身的觀感區別開來，在保證史家旁觀者清之餘，盡力再現「當局者」在歷史情境中言與行的邏輯。

時風所牽引，或被排擯於時風之外。這些成見，並不意味著讀者較之辦報者更早接受了西式體系對於新式傳媒的品評標準。亦即品評標準本身，在形成的初始過程中，諸多傳統因素介入其間——例如對經世文編體例在報刊中之運用持有限的容忍態度、雅俗問題，以及讀者對中國既有的邊緣知識資源的態度等。總之，此一階段的眾聲雜遝，終究強化了《時務報》之業界標竿地位，確認了個別的「輿論界驕子」；至於其他報刊的士人參與者，則多只是在其間投下幢幢暗影。經過此番小高潮，士人辦報即落入低谷，這誠是朝局之變所致，但亦是辦報初期自發膨脹後的收縮。經過一二年低谷期的調整，及海外樣板(主要是日本)的進一步影響，再後出現了規模更大、歷時更久的眾聲喧譁；而維新時期不少士人念茲在茲的士林報刊與外報或商報之區隔的建構，則漸已退居次要的地位。

進一步講，士人辦報的實際後果(不見得是初衷)，更多的是報刊對士林的改造，而非士林對報刊的改造，此或可謂一大體現中外「權勢轉移」的變動。¹⁷⁰同時，這或許也印證了晚清所謂的經世思潮在維新時期及其後的變化軌跡。士人與經世的緊密關聯，今人已多有討論；而經世與報刊則非無縫接軌，傳統士人轉變為「報人」或近代「知識分子」，遂也連帶使經世思潮自頂峰墜落。換言之，此一墜落不純是戊戌政變等突發事件所致。¹⁷¹具體言之，內化於士林的傳媒之變，既促

¹⁷⁰ 這是借用羅志田的提法，見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頁 18-81。

¹⁷¹ 王爾敏認為戊戌政變的發生、百日維新的失敗，是晚清經世之學走向終結的開始，而科舉停廢，則是終結的標誌。見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頁 42-43。馮天瑜、黃長義則稱戊戌變法引起的文化變動已從邏輯上結束了晚清經世實學，但經世思潮的終結點，亦在 1905 年前後的廢科興學。見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頁 536-545。本文有意脫出此類單純針對思想或改革內容的考察方式，然後再糅合上述的兩種意見。

成經世思想擴及空前的廣度深度，又前所未有地放大了此一思潮的內部張力。維新時期之後，儘管經世一語仍被使用，包括以此為名的書刊面世，但以之統攝整個時代思潮，已顯得力不從心。這間隔甚短的一漲一落，很大程度上是媒介變遷所致，卻往往被納入純粹思想史的脈絡，即前已存在的新、舊分野由此愈趨明晰、決絕，甚而開始取代經世意識在知識內容上極大的包容性，以及在此包容性基礎上的中西主客之分，成為之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某種更具宰制性的表述模式與對知識觀念資源的評判、選擇方式。

綜上，本文多面向考察維新時期一份為期較短的刊物——杭州《經世報》，藉以展示中國士人初涉報刊運作時多歧化的摸索。今人所樂道的晚清甲午、乙未以降的思想激變，不應只考慮因各種緣由被納入主流的作者及其文本本身，而應同時措意整個輿論空間的構建與演化，關注其間各方文本的存在方式，及經營者、編撰者、讀者等相關歷史角色對於此類方式的看法，與在實踐中所作的抉擇調適。畢竟許多時候，思想的歷史走向尚有「功夫在詩外」的一面；¹⁷²尤其是維新時期及之後，思想言說已密切結合新式媒體，致使左右思想史方向的要素亦更顯立體多維。同理，在一個轉型時代的初始階段，¹⁷³士人辦報不光有眾星拱月，且有對自設之標竿的若即若離。新式傳播機制

¹⁷² 或如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所歸結的：「若想理解關於某個文本歷史上曾有過的用途和闡釋，就必須確定上述物質形式所產生的意義效應；「『話語序』(再次借用福柯術語)不可能脫離當時的書之序而獨存。」見羅傑·夏蒂埃著，吳泓鈞、張璿譯，《書籍的秩序》，頁2、7。

¹⁷³ 將維新時期視為一轉型時代的起點，代表性的意見參見張灝，〈再認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頁15-23；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頁29-39；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頁48-56；王汎森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

如何本土化的問題未見單一確鑿的答案，我們也就仍須追究傳統自身的彈性與滲透力，及其如何為當時中國既有的知識階層所用，進而催生了在此新媒介中多方探索與博奕的空間。

(本文於 2015 年 7 月 30 日收稿；2016 年 1 月 15 日通過刊登)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80。
- 《申報》(上海)。
- 《利濟學堂報》，收入段逸山主編，《中國近代中醫藥期刊彙編》，第1輯，第1-3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 《杭報》，第3、4號，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廿六、廿七日(1897年8月23、24日)，杭州：浙江圖書館、浙江檔案館藏微卷。
- 《知新報》(澳門)
- 《時務報》，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 《國聞報彙編》，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
- 《新聞報》(上海)。
- 《經世報》(杭州)。
- 《實學報》，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80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0。
- 《甌學報》，第4冊，1930年刊本，溫州：溫州圖書館藏。
-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卷1、卷2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79。
-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1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
- 胡珠生編，《溫州文史資料第8輯·陳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收入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冊，專集補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湯志鈞、陳祖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戊戌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賀長齡、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7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魯迅，《花邊文學》，收入《魯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二、近人論著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收入《民國叢書》，第2編，第49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1928年商務印書館版影印。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王汎森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收入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26-43。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李金銓編著，《文人論政——民國知識分子與報刊》，臺北：政大出版社，2008。

李玲，〈從刊報未分到刊報兩分——以晚清報刊名詞考辨為中心〉，《近代史研究》，3(北京，2014)，頁144-153。

李玲、陳春華，〈維新報刊的「面目體裁」——以《時務報》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2(北京，2012)，頁128-138。

洪九來，《寬容與理性——《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1904-193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胡珠生，〈興浙會和保浙會是兩個團體〉，《歷史研究》，1(北京，1988)，頁96-99。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店，2005。

唐小兵，《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

- 為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 唐海江，《清末政論報刊與民眾動員——一種政治文化的視角》，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 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 徐運嘉、楊萍萍，〈清末杭州的三種報紙——《經世報》、《杭報》、《杭州白話報》〉，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新聞研究資料》，第47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132-139。
- 浙江省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新聞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4(香港，1999)，頁29-39。
- 張灝，〈再認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二十一世紀》，2(香港，1998)，頁15-23。
- 章可，〈論晚清經世文編中「學術」的邊緣化〉，《史林》，3(上海，2009)，頁68-74。
- 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 陳江，〈「報」與「刊」的分離及雜誌的定義——中國近現代期刊史筭記之一〉，《編輯之友》，5(太原，1990)，頁65-67。
-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項士元，《浙江新聞史》，收入方漢奇主編，《民國時期新聞史料匯編》，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民國十九年(1930)鉛印本。
-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 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收入黃克武，《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頁274-303。
- 楊際開，《清末變法與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開放時代》，1(廣州，2001)，頁48-56。
- 賈小葉，〈「新黨」抑或「逆黨」——論戊戌時期「康黨」指涉的流變〉，《近代史研究》，3(北京，2015)，頁23-48。
- 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潘光哲，〈《時務報》和它的讀者〉，《歷史研究》，5(北京，2005)，頁60-83。
- 潘光哲，〈開創「世界知識」的公共空間——《時務報》譯稿研究〉，《史林》，5(上海，2006)，頁1-18。
-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 潘猛補，〈清末溫州三刊物〉，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新聞研究資料》，

第 31 輯，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頁 176-181。

魯小俊，〈課藝總集——清代書院的「學報」和「集刊」〉，《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長沙，2015)，頁 34-39。

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收入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8-81。

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著，吳泓鈔、張璐譯，《書籍的秩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三、網路資料

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http://www.cnbkxy.cn/home>，檢索時間：2015 年 3-4 月。

Reform, Statecraft Thought, and Literati Journalism: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Reformist Magazines through Hangzhou's *Jingshibao*, 1897-1898

JIAGUI XU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During the reformist period of 1895-98, Chinese literati widely started to get involved in the newspaper and magazine business. This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a relatively neglected journal called *Jingshibao*, highlighting its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Progress* (*Shiwubao*), which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representative” of reformist thought of the period. This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media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In terms of their production, literati journals relied on official support and donations instead of purely market-driven competition, though the “oversupply” problem still emerged, especially given the density of the pres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Jingshibao*, located in Hangzhou, therefore found it difficult to compete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centering on *The Chinese Progress* based in Shanghai. In terms of *Jingshibao*'s style and contents, i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clusivity of the statecraft (*jingshi*) tradition concerning foreign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However, readers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ssatisfied with this more traditional approach. In sum, the history of

Jingshibao illustrates a relatively “traditional” way derive reformist impulses from the extension of existing ideas of statecraft. Because of the “quasi-marketization” of this period, however, the status of existing examples continued to be strengthened as the expectation of “reversing the tide” became more difficult to realize than in the previous book-dominated period. The reach and depth of the idea of statecraft were thus unprecedentedly extended by the new media,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s ability to make sense of the era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increasingly clear distinction represented by the *xin/jiu* (new/old) dichotomy.

Keywords: reformism, statecraft thought, literati, *Jingshibao*, media change